

分类号：D61

单位代码：10363

密级：公开

学 号：2221510122

题 目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研究

题 目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ves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of Wanjiang

学生姓名	:	徐筱
指导老师	:	李海涛 教授
专 业	: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方向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论文答辩日期：2025 年 5 月 13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徐薇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徐颖

指导教师签名：

李海清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研究

摘要

皖南事变后，为了继续在皖中、皖南地区开展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皖江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各项事业均取得显著成就，其中经济建设最为突出。“烽火江南鱼米乡”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写照。在这其中，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为根据地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成为推动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

皖江地区在民主政权建立后，在农抗会的领导下，就开始了按保、按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小组，发动群众投资入股创办合作社。在合作社创办初期，虽然面临了一些挑战，但皖江区党委及民主政府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及时应对、果断施策，通过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干部培训、完善监督机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确保了合作社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充分发挥了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作用，不仅有效改善了根据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物资供应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日民主政权的信任和支持。据统计，截至 1945 年底，皖江抗日根据地各类合作社已发展社员超五十万人，年营业额达数百万元，成为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保障军民供给、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支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特殊历史时期，

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其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对于今天发展合作经济、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的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合作经济思想的理论宝库，为新时代发展合作经济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合作社；互助合作

RESEARCH ON COOPERATIVES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OF WANJIANG

ABSTRACT

After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struggle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nhu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the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expanded,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various undertakings, among which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the most prominent. ‘Fierce Fire Jiangnan Fish Rice Township’ is the true portrayal of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Among them,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Cooperative injected strong impetus in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ase area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engine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After the democratic regime was established in Wanjiang are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Agricultural Resistance Associ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utual aid groups wer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guarantee and village, and the masses were mobilized to inves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s.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operative, although it faced some challenges,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 of Wanjiang District always adhered to the people-centered concept, responded in time and made decisive policies, and ensured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through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cadres and perfecting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Under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Cooperatives ga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organizing and serving the masses,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masses in the base areas, raising the level of material supply, but more importantly enhancing the trust and support of the masses for the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regime.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by the end of 1945, all kinds of cooperatives in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had developed more than 500,000 members, with an annual turnover of several million yuan. They became an important pillar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ase area, ensure the supply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resources, and consolidate the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regime, laying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mass foundation for winning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Cooperative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China Communist Party creatively combining Marxist cooperative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a's concrete reality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lesson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economy and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is helpful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enrich the theoretical treasure house of China Communist Party's cooperative thought, and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XuXiao (Study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upervised by Li Haitao

KEY WORDS: Wan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ooperative Economy;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绪 论	1
第一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背景	8
第一节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的指导思想	8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思想	8
二、列宁的合作制理论	10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合作经济思想	11
四、皖江抗日根据地领导人的合作主张	12
第二节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的实践基础	13
一、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经济实践	13
二、皖江地区互助合作经验	14
三、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需要	15
第二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18
第一节 合作社初步发展阶段（1939—1942）	18
一、农业互助组初步发展	18
二、各类合作社初步组建	19
第二节 合作社巩固与扩展阶段（1942—1944）	20
一、农业互助组广泛开展	20
二、各类合作社巩固与发展	22
第三节 合作社成熟与壮大阶段（1944—1945）	23
第三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组织运作	26
第一节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类型	26
一、生产合作社	26
二、消费合作社	27
三、运输合作社	28
四、其它类型合作社	29

第二节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管理原则	30
一、坚持民主原则	30
二、坚持自愿原则	31
三、坚持平等原则	31
第三节 合作社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33
一、合作社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33
二、合作社面临挑战的应对对策	35
第四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贡献	38
第一节 促进经济发展	38
一、推动农业生产发展	38
二、加速工业经济发展	39
三、助推商业贸易繁荣	40
第二节 改善民众生活	41
一、救济灾荒	41
二、提升民众生活水平	43
第三节 涵养良好社会风气	45
一、促进妇女解放	45
二、改善社会不良风气	46
第四节 支援军事战争	47
第五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建设的经验启示	49
第一节 坚持党政联动引领是合作社成功的根本保证	49
第二节 尊重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是合作社遵循的基本原则	50
第三节 立足现实，以问题为导向是合作社制定政策的基本要求	52
第四节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合作社发展的核心原则	53
结语	54
参考文献	55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59
致谢	60

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的疯狂破坏和国民党的封锁夹击下，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克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总结和推广组织合作社的经验，积极发展合作社经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 1943 年 11 月 29 日招待模范英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明确指出：“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而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基本形式就是合作社”。^①皖江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广泛开展互助运动，普遍发动群众投资兴办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合作社的广泛组建为推动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2 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合作社作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始终是会议关注的重点。会议明确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支持农民合作社，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党的百年征程是一部不断深化对农民问题认识、创新农民组织方式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将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政治层面赋予农民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在经济层面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尽管组织形式具体多样，但发展合作社、走合作化道路始终是最本质、最有效的实践路径。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是皖江地区领导人在党的相关政策指引下，将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与皖江地区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由于目前学术界还未对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展开充分研究，因此本文有助于补充学术界的相关短缺，丰富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中国化的研究。

此外，尽管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但历史经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当代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为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复兴提供重要借鉴。

①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30.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目前,虽然学术界对抗战时期根据地合作社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总体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就区域而言,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而对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研究相对较少。总体而言,学界对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一)对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综合性研究

关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整体研究,以1990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皖江抗日根据地》^①为代表,该书主要收录了从1938年至1945年涉及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文件和电报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皖江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由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史》^②利用各级党史部门编写的大事记、专题资料,以及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所属各县党史研究室等馆藏资料,对皖江抗日根据地从开辟、创建、建设、巩固的整个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皖江开发史》^③总结了皖江地区从古到今的开发历史,里面有详细章节论述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程。过仕伟总结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特点:建立最晚、发展最快;地位突出、影响深远;经济富庶、贡献巨大。^④

(二)对皖江抗日根据地的专题研究

关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学术界已发表大量富于创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财经工作、文化建设、廉政建设、社会事业、军事斗争和著名人物等方面。

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研究著作当首推应兆麟主编的《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⑤,该书是一本全面反映抗战时期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著作,由生产、贸易、财政、金融四个部分构成,按经济部门进行分类编辑,使读者对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脉络一目了然。1983年由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省档案馆联合编写的《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主要收录了皖江抗日

①《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②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皖江抗日根据地史[M].巢湖: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2000.

③郭万清,朱玉龙.皖江开发史[M].合肥:黄山书局,2001.

④过仕伟.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发展及其主要特点[J].安徽史学,1992,(03):67-72.

⑤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根据地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史料,^①该书材料主要来源于安徽省档案馆、博物馆等馆藏资料以及《抗敌》《皖南人》《大江报》等根据地创办的报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对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政策、减租减息以及财经工作等方面。甘迎春对皖江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实施的背景、主要内容及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虽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问题,但从根本上而言,此政策是符合皖江地区实际的,保证了皖江地区最后抗战的胜利。^②王明前主要论述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过程、取得的成就以及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工商业、金融和财政的经济概况。^③张鸣祥从生产、财政管理以及贸易金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皖江抗日根据地财政政策的作用与经验进行总结。^④吴云峰从合作社、手工业、工业、商业贸易、货币金融和税收政策六个方面论述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指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中最为出色。^⑤

胡惠芳聚焦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详细论述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党组织从思想教育、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推进廉政工作,有效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⑥胡茂胜系统阐述了吕惠生“立足抗战、着眼建国”的教育理念,指出吕惠生所提出的“教育为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结合、教育与社会联系”的三大教育方针为皖江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⑦马飞飞详细分析了皖江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背景、举措及成效,指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高了人民政治参与的意识 and 能力、推动了根据地的政治创新与发展。^⑧

(三) 对全国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研究

皖江抗日根据地作为全国 19 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它的合作社建设当然

①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2)[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②甘迎春,徐春霞,赵玉青.1942 年—1945 年皖江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研究[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6,(S1):60-62.

③王明前.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与财政经济[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7,(05):14-18.

④张鸣祥.略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J].黑龙江史志,2008,(08):18-19.

⑤吴云峰,金良文.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J].巢湖学院学报,2005,(01):83-86+97.

⑥胡惠芳.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J].池州学院学报,2019,33(02):61-64.

⑦胡茂胜.吕惠生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J].沈阳大学学报,2007,(06):102-104+108.

⑧马飞飞.皖江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J].党史博采(理论),2018,(04):14-15.

与其它根据地的合作社建设有共性。因此，除关注皖江抗日根据地本身外，还应应对同时期其它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研究进行详细梳理。

研究农村合作经济的成果颇丰。米鸿才在其主编的《合作社发展简史》^①中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系统梳理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脉络。全书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学术原则，注重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的有机结合，为深化农村合作经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和理论参考。王贵宸编著的《中国农村合作经济》^②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新中国成立前旧中国的农村合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农村合作。陈廷煊编著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史》^③主要论述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发展进程中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历史，其中有多篇章节分别对不同根据地的合作经济、合作社发展情况进行了有关介绍。

此外，关于抗战时期合作社事业的史料论著也颇为丰富，由史敬棠等多人编著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④系统收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文献，为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合作思想与实践提供了重要支撑。由杨德寿主编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⑤收录了大量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合作社发展的章程条例等文件，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对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加以考察的有：梅德平系统梳理了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的历史演进轨迹，指出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农村互助合作组织是农民自发和自愿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受经济发展状况及自然状况等因素的限制，互助合作的组织小且结构较为分散。^⑥王卫红^⑦基于翔实的数据资料，深入分析了抗战时期合作社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价值。冯越、倪进以陕甘宁边区为个案，从思想史维度考察了毛泽东农业互助合作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⑧

①米鸿才.合作社发展简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②王贵宸.中国农村合作经济[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③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④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M].北京:三联书店,1957.

⑤杨德寿.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⑥梅德平.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变迁的历史考察[J].中国农史,2004,(02):103-108.

⑦王卫红.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历史功绩及经验启示[J].理论探索,2008,(04):93-95.

⑧冯越,倪进.抗战时期毛泽东农业互助合作思想之考察——以陕甘宁边区为例[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118-121.

就安徽区域研究而言,学界呈现出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特点。汪效泗从整体上勾勒了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脉络,对其历史进程与实施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①万勇选取乌江地区的合作社作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农村合作运动的内在发展规律。^②吴春梅着重考察了抗战前安徽农村合作社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成效,指出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社的兴起与发展,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价值。^③黄昊将抗战时期的合作社置于县政改革框架下进行考察,揭示了其行政化倾向。^④曹承俊重点探讨了华洋义赈会在灾后重建中的合作社实践。^⑤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外学界关于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专题研究尚付阙如,但有国外学者对中国的合作社运动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美国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易劳逸编写的《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⑥分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合作社运动。他指出,国民党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一场温和的“绿色革命”型的合作运动,所以没有改革农村社会政治关系,这使得合作社被地主、富农和商人等乡村权贵控制着,成为他们提高自身优越经济地位的工具。马克·凡尔登编写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⑦介绍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发展状况,充分肯定了合作社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毕克伟、赛尔登、弗里德曼、共同编写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⑧对河北省饶阳县一个典型合作社进行了详细研究,探讨了合作社对农村社会及农民生活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对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专门研究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著作和学术文章并不多。因此,未来需要进一

①汪效泗.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5):591-596.

②万勇.民国时期安徽的农村合作运动[D].安徽大学,2007.

③吴春梅.从分散到合作——民国时期安徽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02):40-49.

④黄昊.抗战时期安徽县政改革研究[D].安徽大学,2011.

⑤曹承俊.华洋义赈会与安徽水灾救治[D].安徽大学,2012.

⑥(美)易劳逸;陈谦平,陈红民译.流产的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⑦(美)马克·赛尔登;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⑧(美)毕克伟,赛尔登;陈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步挖掘与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相关的史料，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视角对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进行研究：

一、加强历史分期与阶段特征的研究。当前对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研究多集中于整体描述，缺乏对其发展阶段的细致划分和分析。未来的研究应以合作社发展的关键节点为依据，重新划分历史阶段，更加清晰地把握合作社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态和特点。

二、探索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的联系。各抗日根据地合作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代合作社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未来的研究应超越历史背景，从共性与个性的角度，探讨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与当代农业合作社的内在联系。

三、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本研究严格遵循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将原始文献作为理论建构和历史阐释的根本依据。在文献运用方面，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一，系统搜集整理与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相关的一手史料，包括档案文献、地方志、报刊资料、回忆录等原始文本，通过文本细读和史料互证，夯实研究的史料基础；其二，全面梳理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和研究视角的多元拓展，以此确立本研究的学术定位和创新空间。这种双重维度的文献工作方法，既确保了研究的史料可靠性，又实现了学术脉络的传承与创新。

历史分析法。历史分析方法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其核心在于运用发展和变化的视角来审视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发展离不开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在分析评价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时，只有将其放入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出正确的评价。

个案分析法。在各根据地合作社发展中，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与其它根据地合作社有共性的一面，也有自己个性的一面。本文希冀通过研究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把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合作经济运动的整体发展规律。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厘清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二是探究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组织运作，三是挖掘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启示。

本课题的研究难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与研究。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研究涉及经济、政治、历史等多门学科。史料类型多样，需要进行系统搜集。此外，由于历史档案散佚、部分档案尚未完全解密等情况，限制了资料的获取，制约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二是经验总结与提升不易。深入挖掘有关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内容，剖析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历史评价和当代启示，这不仅需要将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相结合，还必须从皖江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全面分析。

三是研究内容的整合与论述。为了从整体上系统地研究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本课题需要整合大量资料，对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梳理，包括皖江抗日根据地创建合作社的发展背景、发展历程、组织运作等。因此，在庞大的材料中整理出清晰的脉络，也是本课题面临的难题之一。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主要集中在选题、史料的选用以及研究视角的转变：

选题的创新：目前以“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为专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尚属空白。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缺乏对合作社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

资料方面的创新：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大量收集与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相关文献，借助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雨花英烈日记2》（编录的是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的日记）以及无为市档案馆馆藏资料，进一步挖掘新材料中蕴含的丰富内容，为本课题研究提供资料支撑。

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及其组织运作、发展困境等视角系统研究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历史演进与运行逻辑，突破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宏观叙事框架，着力揭示战时特殊环境下，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微观运行机制。

第一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背景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合作经济的理论为其提供了思想指导，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经济实践为其积累了宝贵经验，而皖江地区的民间互助传统则为合作社的推广奠定了群众基础。这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得合作经济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支持抗战的重要经济力量。

第一节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的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过程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大多数小农都处于分散的、孤立的生产状态。“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①马克思认为“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②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规律以及对当时欧洲工农业生产发展现实状况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重要理论判断：传统小农必然走向灭亡。

而合作社则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首先，小农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小农阶级往往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考虑怎样去挣自工资的一个借口”。^③合作社则恰好迎合了小农的私有观念，通过占有而不所有的形式使小农阶级的财产得到保护。其次，合作社能将小块土地联合起来进行耕种，不仅方便规模化经营，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最后，合作社形式灵活，可以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为合作社普遍推广提供了实践可能性。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62.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12.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66.

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系统阐述了引导农民走向合作社道路的具体原则：

（一）自愿原则。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来剥夺小农。这就是说，只要没有遵从农民的意愿，采取了强迫的方式，不管是有“报偿”还是没有“报偿”都是一样，即都是剥夺农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一步论述不能用强制方法，在强调自愿原则的同时，提出了示范和帮助的办法。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引到革命方面来，“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①要通过说服教育，办好典型示范，让农民坚信合作社是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的有效组织载体。

（二）循序渐进原则。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至于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②引导小农经济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是不可行的，必须经过合作社这一中间环节。这一理论判断是基于对阶级斗争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深刻把握，这样既避免了强制集体化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又为实现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平稳过渡提供了现实路径，是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三）国家帮助原则。“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代替小地块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③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其难以独立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依靠国家在物质、财政等多方面的支持。这种多维度的支持体系能够增强小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激发其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合作思想，为我国的合作社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温这些经典论述，对于探索中国特色农业合作化道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38.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1.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28.

二、列宁的合作制理论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俄国具体实际,对合作制度产生了新的认识。首先,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①这为合作社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次,列宁主张从流通领域入手,通过商业合作社这种容易被农民接受的形式,逐步向更高级的合作形式发展。这种渐进策略既尊重了农民习惯,又为最终实现生产合作社创造了条件。

在领导农民合作社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列宁始终坚持自愿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他强调:“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自由发起的、经他们实际检验确有好处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②非自愿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只会是“昙花一现”。列宁同时指出,贯彻自愿原则必须坚持典型示范。他认为只有通过示范公共经济的成功实践,才能让小农真正自愿地加入集体经济。

除此以外,列宁还特别重视用文化来对小农进行改造。他深刻指出:“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③为了实现小农经济的跨越发展,他要求全体人民必须在文化素质方面得到发展。首先是要人人识字,使农民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其次是要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使农民能读书看报并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最后是要让农民学会文明经商,使农民掌握市场经济的经营理念 and 技能。此外,列宁认为合作社作为一种企业,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应建立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经营思想、经营作风、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其核心是通过现代合作社文化的熏陶,逐步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为农业合作化进一步发展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

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列宁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主题。在《论合作制》中,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流通领域中创办合作社、文明经商、靠文化发展合作社等观点,这些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1.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7.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2.

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探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合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合作经济思想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建党以来有关农民问题的第一个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在党的“三大”上得以通过。决议指出：“农民的反抗精神是由于乡村的压迫而产生的，这样，中国的工人阶级应该联合雇工和小农佃户，以保护农民利益、推进国民革命运动”。^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合作社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团结群众、提高群众觉悟的重要手段。他们便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和合作社，动员广大民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农民通过互助组共同劳动，工人通过消费合作社购买廉价生活用品。这些合作社形式虽然规模较小，但为后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如果我们进行必要的指导，随着农会的发展，合作社运动可以发展到各地”。^②

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然而，在得到土地后，农业生产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过去许多地方政府，将没收地主豪绅的耕牛和农具，没有进行很好的分配，至于他们分给贫雇农后，因缺少合作组织，以及无人管理，把耕牛和农具弄死弄坏了许多”。^③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制约。1932年7月，张闻天提出“苏维埃政府重新分配土地后，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要增加生产使苏维埃区域的土地一寸不要荒废，要组织生产队，适当调动牛力和人力帮助牛力和人力缺乏的地区耕种”。^④进一步强调了组织化生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实地调查，认识到合作社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指出“发展合作社是刻不容缓的”。^⑤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决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一时期，毛泽东相继发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论合作社》《组织起来》以及《必须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13-119.

②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M].北京:三联书店,1957:75-76.

③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M].北京:三联书店,1957:89.

④张闻天.张闻天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276.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14.

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章，系统论述了合作社的性质、形式、原则和内容，并从争取抗战胜利甚至未来发展到达社会主义的层面阐述了发展合作社的重大意义。基于深入的社会调查，毛泽东将减租减息和土地革命定位为“第一个革命”，而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为“第二个革命”。在毛泽东关于发展组织化生产思想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号召，在边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一时期，根据地普遍建立起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信用合作社等。

四、皖江抗日根据地领导人的合作主张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42年3月，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在《关于第七师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一文中就指出：“军队是人、钱、地盘三件事缺一不可的”。^①并就财政经济及物资问题提出了七条意见，大力督促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次年，在皖江抗日根据地举办的农业生产合作座谈会上，曾希圣指出：“世界有两种生产方式，一是资本主义生产，以机器集体生产了，但生产物与生产者俩相矛盾，故它亦非好办法。第二是苏联的生产，其结果：劳动者与生产物的正确结合，没有矛盾了，再往前进，则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了。第三是我中国的方式了，即非英美式的，又非苏联式的，而是新民主主义式的，目前是一一生产关系不变化，生产方式要改变，由单一生产，走向集体生产，这是将社会大大推进一步。延安人民丰衣足食，亦即这个生产方式的改变，全部重要性在此”。^②他认为集体互助不仅能解决劳动力问题，还能改进生产方式，促进社会进步。基于这一认识，他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积极倡导并系统推进集体互助制度的实施。

1942年，叶进明担任七师供给部部长。在此之前，他在皖南时曾参加过“工业合作协会”的工作，对发展合作事业与坚持抗战到底的密切关系深有体会。为了开辟财源，发展地方经济，叶进明多次强调“提倡搞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③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多次在日记中提及合作对促进经

①《曾希圣传》编撰委员会.曾希圣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35.

②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47-248.

③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2)[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564.

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合作，一个人做事，只得到一个人的成效，十个人单独的做事，也还是得到十个人的成效，但十个人若是合作起来做事，就必定能得到大于十个人做出来的成效。这因为合作了，就能分工，分工的结果，既免除了工作中的浪费，又促成了工作上的精进，总计起来，成效必然增加了。所以，合作是农工商各业最好的制度，我们应该大规模地来推行”。^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各领导人纷纷鼓励在根据地普遍组成合作社。为推动根据地合作社事业的规范化发展，皖江区党委及民主政府多次召开合作座谈会，为各地区组织起来提供具体的方法指导，如：一组自然村，组织几个互助小组，行政村可成大组，乡则为劳动互助社，乃由小组分社到社，到联社，由下而上^②。同时又为各村组织起来后制定明确的遵循原则，如：要自愿，但非自流的、要公道、要有公共的劳动纪律、要使百姓看到利益，得到利益等^③。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皖江抗日根据地领导集体对合作运动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节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的实践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经济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合作社不仅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手段，更是组织动员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形式，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功能。自192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便积极在工农运动中开展组建合作社的活动。毛泽东在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时，便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积极带领工人组建消费合作社。该社创立之初，由于资金仅有百元，无法独立开设经营场所，只得暂时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内开展业务。业务经营数量很小，仅贩卖少量的布匹和日用品。同时，因缺乏经验，合作社在具体经营过程出现管理不善等问题，以致在组社几个月后就出现领导吞款之事，大失工人信仰。对此，中共通过加强合作社领导、订立《办事公约》、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等方式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在此之后，合作社严格贯彻为工人服务的办社宗旨和民主办社原则，经营工人群众必需的粮食、衣服、日杂用品

①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02.

②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62.

③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48.

等，逐渐赢得工人拥护。在大罢工胜利后，随着工人俱乐部成员的全部入社，合作社资金达到一万余元，这种发展引起资本家及军阀的恐惧，合作社也因此遭到破坏而停办。

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离革命导致大革命失败。这一转折迫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反思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色政权的建立，为各项政策执行提供了平台，合作社政策也开始付诸实施。据“红色中华报”登载的不完全统计，到1934年4月，兴国县的劳动互助社有1206个，拥有社员22118人；犁牛合作社72个，社员5552人；股金5168元以及耕牛121头。^①瑞金的劳动互助社共拥有社员4429人，犁牛合作社37个，股金1539.5元。^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有效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保障抗战胜利，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和《论合作社》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略方针，着重指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是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针的确立，为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指明了方向。1943年春季，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劳动互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创造性地改造和利用传统劳动互助形式：一方面充分发掘变工、扎工、唐将班子等民间固有互助组织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记工算账等规范化制度，革除其中不合理因素，切实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在这一系列有力措施的推动下，各抗日根据地以及新解放的广大地区都发展了一批合作社，到1944年，陕甘宁地区组织起来的人数81128人、晋绥地区156550人、^③晋察冀地区562704人。^④

二、皖江地区互助合作经验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在近代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小农经济始终占据着我国经济的主导地位。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我国广大农民陷入极度贫困之中。为了摆脱困境并提

①和兴国比一比[N].红色中华,1934-04-30(02)

②瑞金在秋收中怎样解决劳动力的问题[N].红色中华,1934-07-19(01).

③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N].解放日报,1944-02-08(01).

④晋察冀生产运动中创造许多好办法[N].解放日报,1945-01-18(01).

高生产，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农民找到了换工互助的办法。

皖江抗日根据地一带的劳动互助主要盛行“变工”。“变”意为“交换”或“调剂”。变工贯穿于开荒、犁田、栽秧、车水、割稻等耕作全过程。它主要有以下形式：一种是人工“变”人工。因种庄稼要不违农时，为能及时翻地下种，锄草收割，于是三家五户或者整个庄子的劳动力就组织起来，按当地的情况，今日帮我种，明日帮你割，互相帮助，使家家都能及时下种收割。二是人工“变”牛工，牛工“变”人工。有些家庭畜力强，劳动力弱；有些家庭劳动力强，畜力弱，或者就没有牲畜，于是实行变工。通常是三个人工“变”一头牛工，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三是生产技术上的互助。有些人擅长某些技术，却不熟悉其它领域，因此通过取长补短、相互协作来实现技术上的互助。这些互助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简单直接的短期协作，也有复杂系统的长期合作。

人们利用这种换工互助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的起点，能够独立地进行生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了适合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民需要的合作形式。但是，这种换工互助实质上是个体经济的一种产物，是中国农民贫困生活的一种表现，是劳动协作的一种低级形式。

除此以外，在安徽省合委会的领导下，皖江地区的合作事业早在抗战前就有所发展。如在农业生产方面，在含山地区，合作社办事处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积极引导各基层开展松苗规模化种植。办事处不仅提供技术指导，还主动承担起与林场的对接工作，统一采购优质树苗，既保证了树苗质量，又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了成本。在纺织方面，合作社也展现出组织优势，以巢县大吴村运兼信社为例，该社购入织机 10 架，组织社员开展纺织生产。这一时期，在省合委会的支持下，安徽合作社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尚未达到普及程度，且合作社存在教育不足、社员能力薄弱、过于依赖合作指导机关等问题。

三、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需要

在为一种历史现象寻求理论上的根源时，“我们要对社会状况、社会的经济状况进行分类，要找出使一种状况让位于另一种状况的明白易懂的原因”。^①在抗日战争前的黑暗年代里，生活在这片富饶土地上的人民过的却是极端贫穷的生活，反对派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残酷压榨、

①(英)约翰希尔斯,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9.

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水灾、旱灾、蝗灾等弄的皖江地区遍地惨景。

土地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我国农业问题的基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在抗战前期，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占着统治地位，皖江地区土地占有情况非常不合理，土地集中现象十分严重。占总人口数少部分的地主富农拥有大部分土地，而占总人口数大部分的农民却没有土地可以耕种。以巢县而言，占有总户数 2.4% 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 70%，而占总户数 80% 的广大贫雇农，仅占有全部耕地的 8%。^①超半数的生产者不能直接占有生产工具——土地，广大农民因此大多沦为雇农、佃农，靠租种土地维持生活。土地兼并加剧导致佃、雇农人数增多，农民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封建剥削，连起码的温饱都难以维持。农业生产也因此受到严重的桎梏。

在传统的农业中，除了土地以外，耕牛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在皖江地区耕牛的数量非常少，耕牛数量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除了极少部分牛会分配给中农、贫农外，大多数的牛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并且中农、贫农分配到的都是品质较劣的黄牛，而质量较优的水牛都在地主、富农手中。贫苦农民没有耕牛，便不得不向地主、富农租借耕牛来耕种自己可怜的零细土地。因此耕牛租借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牛租剥削也是十分的苛重，泾县的牛租高达牛价的 20%，比地租还要苛重得多（地租约相当于战前地价的 10%）。

劳动力是生产资料中最主要的资源，也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皖江地区的农民却因为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重重压榨，不得不抛弃田地，放弃农业生产。“多数贫农已抛弃农业生涯，离开乡村，而为城市苦力。妇孺老弱亦多流为乞丐”。^②除此以外，日本侵略者还在皖江地区大肆掠夺劳动力，如 1943 年 4 月 7 日，无为县城关西桥一带即一次被捉去 160 余人，^③许多地方的青壮年甚至日不敢出门、夜不敢宿家。

正当皖江地区农业危机四伏之际，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了侵华战争，皖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经常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清乡”“扫荡”，仅 1943 年一年，日军对皖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数十次的“清乡”行动，这对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除此之外，皖江抗日根据地该阶段还频

①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6.

②余醒民.安徽怀宁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J].经济评论,1934,1(4):64.

③程必定.安徽近代经济史[M].合肥:黄山书社,1989:294-295.

繁爆发洪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据记载：1942年，“安徽本年水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灾区遍及芜湖、宁国、南陵等二十一县”。^①除水灾之外，1943年，巢南地区及临江白茆区、无为石涧区突发大规模蝗灾，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影响。据史料记载，当时蝗灾肆虐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蝗虫所到之处，除少数带有苦味的植物得以幸免外，其余农作物均被啃食殆尽。

综上所述，由于敌祸横行、天灾肆虐，皖江抗日根据地的乡村经济已处于积重难返的恶性循环境地，而皖江抗日根据地的乡村经济也只是全中国乡村经济的缩影。在社会大背景的影响下，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金都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短缺。在劳动力锐减、土地荒芜及耕畜缺乏的严重情况下要想恢复根据地的农业，组织人力、畜力进行互助生产已是形势所趋、势在必行的唯一举措了。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任何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②并且指出所谓自己动手，在目前条件下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除军民一起都参加生产外，最重要的便是实行互助合作。

①皖省水灾难民待救[N].新华日报,1942-8-29(02).

②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0.

第二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委和民主政府始终注重发挥合作社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方针政策。根据皖江地区实际情况，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以农村为主的根据地环境下，皖江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民主政府在根据地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效动员了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参与合作事业，在夹缝中不断发展壮大合作社。

第一节 合作社初步发展阶段（1939—1943）

在土地私有制下，农民、土地、耕畜、农具及劳动力间处于不平衡状态，再加上耕作方法落后，导致农业生产面临诸多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土地与劳动力配置失调：或土地充裕而劳力不足，或劳力过剩而土地匮乏，抑或人力充沛却耕畜短缺。为破解这一难题，吕惠生指出，发展农业经济需把农村合作社普遍组成，把个体的经济合成集体的，然后联合许多小的集体成为一个大的经济总体，只有这样，农民生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①

一、农业互助组初步发展

随着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日寇政治诱降下，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任务。国民党开始实施邮政封锁、切断大部分外部援助渠道并频繁制造军事摩擦。反共高潮不断升级，边区被封锁，物资供给更加困难。为了获取抗战动员的经济力量，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提纲《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开展生产运动，“一切可能的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房、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②

皖江抗日根据地处于农村，主要的生产是农业生产，发展农业是解决根据地经济问题的主要办法。在皖江区党委及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坚持群众

①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03.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1.

自愿原则，因地制宜地组织贫农、雇农以及劳动力参与互助合作。同时，也积极吸纳中农甚至富农加入合作组织，形成了广泛的生产委员会或生产小组。这些组织积极协助每家每户制定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

互助合作内容丰富多样，完全由农民根据实际需求自愿确定，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如耕作、收割、脱粒等。此外，还在耕牛、农具、水利设施的使用上实现了资源共享与合作。互助的形式灵活多样，既有简单直接的临时性协作，也有复杂系统的长期性合作。具体形式包括“扯伙”（短期协作）、“换工”（变工，即劳动力交换）、“耕牛队”（集中使用耕牛）、“互助组”（固定的小组合作）以及“匀田互助”（土地资源的合理调配）等。还可实行县与县之间的大变工，由行署及皖江抗联有计划地实行调剂。农忙时各家可抽出一样多的劳动力实行集体轮耕。例如，有三家换工，一家有田五亩，一家有田十亩，一家有田九亩，在插秧时每家划出五亩，出相同数量的劳动力进行集体轮流插秧，余下的田可自己来种。而且九亩田和十亩田的还可以再进行再换工四亩，如此只剩下一亩自己耕。

为促进互助合作合理有序发展，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一）一定要深入打通彼此的思想，争取自愿，不可光靠号召。（二）组织中基本要有骨干，组长、社长、指导员等，这些人必须大家选举……^①这些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皖江抗日根据地从传统的个体生产转为集体合作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各类合作社初步组建

面对日伪的经济封锁，皖江抗日根据地各县的农民团体纷纷响应号召，普遍组织合作社，以解决农民的急需。如铜陵的三凤乡、繁昌接晏乡、南陵三里乡、泾县的田中乡、云岭乡、桃潭乡等地相继成立了供给或借贷合作社。桃潭乡供给合作社是由工抗会与农抗会联合创办的，共发行 800 股，每股两元，募集资金 1600 元。为防止资本过度集中，每人至多限十股，确保了合作社的群众属性。1940 年 5 月，铜陵三凤乡的农抗会决议向各保富户借款 2300 元，由总农抗会负责，组织小型农民借贷所，每保分得 50 元，专供贫农短期之急用，免

^①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62.

利出借。^①

在此阶段，合作社虽有初步发展，但这些合作社是由于农民迫切需要，自动组织的，政府只起到引导和鼓励作用。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有些合作社既没有合作社章程，也没有培训干部的工作，在合作社组织上、业务性质上及经济分配上都有些偏向。组织上是有名无实，既无独立的组织，又无基本的群众，往往是农抗组织的一个名义上的组织；业务性质上缺乏一定的业务内容，如生产、运销等，变成了半权力机关，强制或干涉别人的经济生活，这些倾向都影响了群众和股民的积极性，不利于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合作事业尚未全面展开。

第二节 合作社巩固与扩展阶段（1943—1944）

为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号召，1943年，中共中央华中区要求：“各地必须根据延安发展生产以及如何组织劳动合作的经验，配合各地个别具体的实况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经验，在群众自愿原则下普遍提倡和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劳动合作运动，并把提倡劳动互助与组织劳动合作作为领导农民发展生产的主要宣传教育与实际计划内容”。^②皖江抗日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在全面推进减租减息运动的基础上，大力支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引了群众的广泛参与，成为继减租减息之后又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一、农业互助组广泛开展

皖江地区的互助运动是在典型事例的教育、影响下逐步推广与发展起来的。巢县槐林区蒋家冲是实行变工互助的典型村庄，据当时的《大江报》报道：蒋家冲过去是个有名的“赌博村”，村民们“正月里过年，二月里赌钱，三月里看戏，四月里种田。”^③人们整日恋于赌钱而无心种田，以至每年有许多荒田无人耕种，农民越来越穷。自从民主政府组织了变工队，将男子、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进行劳动互助后，蒋家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兴起了全村的互助热潮。全村仅1年就节省人工（忙工）在1000个以上。同时还增强了村里的团结，杜

①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41)供销合作社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33.

②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中共中央华中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233.

③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4.

绝了赌博。家家户户有吃有穿，使原来贫穷落后的山村做到丰衣足食，成为当地的一个模范村。仅 1944 年 9 月到 1945 年 4 月，蒋家冲村的稻谷、山芋、棉花、麦、花生，分别比实行变工前增产 215%、113%、133.6%、14.9% 和 60%。^①此外，这个村还开荒 36 亩，开荒地共收烟叶 3 担，山芋 300 担，芝麻 5 斗，棉花 2 担。这个村共有 38 户，过去有 3 家经常讨饭，27 家缺吃少穿。1943 年日军进犯，烧光了房屋，抢尽了衣物。到 1944 年家家户户有吃有穿，讨饭的一个也没有了。^②蒋家冲的变化，集中反映了根据地生产、生活的变化，显示出了变工互助的巨大成就，影响了四周村庄纷纷组织换工队，积极从事生产。

1943 年，无为县各地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农会组织为依托，广泛吸纳劳动积极分子参与，组织生产指导委员会或生产指导小组，通过深入农户调研、召开群众座谈会等方式，帮助农户制定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据原牌抽乡（现原响山公社）调查，当时参加变工互助组已占农民 90%，该乡某某村的 23 户中，贫农全部参加了变工互助组织。^③

和县郝家村的二十九户人家中，有二十户因缺乏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而面临生产困难。抗联首先选择该村作为换工试点，以点带面推动互助合作。在村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后，由几名干部带头尝试换工修筑圩堤，结果证明换工不仅节省了工时，还提高了劳动效率，激发了大家的干劲。这一成功经验逐渐推广，从最初的几户发展到几十户，最终全村都加入了换工组织。妇女负责车水灌溉，老年人承担烧饭和照看牲畜的任务，甚至连小孩也被组织起来拾麦穗、砍秧草，全村上下无一人闲散。随着换工范围的扩大，小规模换工逐步发展到全村范围的集体换工，为提升村民的换工积极性，抗联还规定对劳动特别突出的可以加工并奖励，马虎的要减工并批评，大家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在换工过程中，和县广大基层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主动将自家农具无偿借给困难群众使用，甚至优先用自家耕牛为贫困家庭犁田；在农忙时节，他们先帮邻里插秧，最后才顾自家农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村民，在全村范围内掀起了“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生产热潮。

①欧阳发.经济史踪[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207.

②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4.

③无为:无为市档案馆,1-13-1963-Y-1-0020,16.

二、各类合作社巩固与发展

皖南事变后，为整合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军委做出战略部署，将成功突围的皖南部队与江北地区分散游击的各部进行整编，于1941年5月1日正式组建新四军第七师。在七师组建的同时，党领导的无为县民主政府也成立了，吕惠生同志任县长，皖江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由此得到发展。随着七师部队的不断扩大，根据地也不断发展，1942年5月13日，“皖中行政公署”成立并下辖无为、巢县、桐城、和县、含山、繁昌等县及其它地区，这为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方保障。1943年，七师队伍发展到六千多人。为适应斗争需要，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正式成立了“皖江行政公署”。通过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皖江抗日根据地实现了领导权的集中统一。在统一的领导核心下，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

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成立后，便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助推根据地合作社发展。首先，民主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和法规。1943年8月12日，皖江行署颁发了《合作社暂行登记条例》作为合作社运动发展的方针，该条例明确了合作社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形式，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了详细的理论指导。其次，为促进合作社健康有序发展，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合作社指导机构——合作社事业指导室。合作事业指导室的核心职责是负责制定并颁布合作社的组织章程，引导根据地合作事业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为了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在合作社内部设置了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三种机构。社员大会为合作社的最高组织，由全体社员组成。根据地按期召开社员大会，由十人选举一名代表，召集社员代表会与理事会。专职人员定期向全体社员汇报合作社经营情况并征求改进意见。每个社员都可以通过社员大会行使自己的权利，自由地发表建议，这极大地提高了社员的参与度。管理委员会是合作社的管理机构，由社员通过社员大会选举自己信任的且有能力的社员组成委员会，主要负责社员大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决策。审查委员会作为合作社内部的监察机构，主要负责审查地区的税则修订与支出经费预决算。

皖江抗日根据地还建立了统一的、规范的、科学的会计管理体系。首先，根据地实现严格的收支登记制度，确保每一笔资金往来都有据可查，杜绝财务

管理的混乱现象。其次,根据地建立了完善的报表制度,要求征收机关除设置规范账簿外,还需定期提交财务报表,确保各区总会计能够及时准确反映财政状况,实现财务信息的公开透明。最后,根据地还创新性地建立了金库制度,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为执行收钱不管钱,使金库制度更加健全,皖江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将原属皖中财经会的金库划经委会领导,并明确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皖江地区合作社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已成立的有汤沟、陡沟、无南等消费合作社以及汤沟运输合作社,营业种类主要为食盐、粮食、日用品。在众多合作社中,陡沟合作社表现最为突出,该社成立两月后即盈利19万元,在社员分红后,还专门拨出大笔资金补助贫苦抗属以及兴办公益事业。该社后又成立生产合作社,先后开办纺织、织布、肥皂工厂,将消费与生产相结合。为扩大群众参与度,合作社将每股金额从最初的200至500元调整为50至100元,并采用劳力与粮食投股办法,欢迎贫苦农民大量入股。^①

1943年间,虽然根据地内战事频发,日军和驻大别山桂顽相互勾结,先后向巢无中心区轮流进行大规模进攻,但是在七师将士们英勇奋战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皖江抗日根据地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还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范围。军事上的胜利又进一步鼓舞了军民士气,增强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广大群众积极地投身到党领导的合作社事业中。到1943年底,广大农民通过劳动互助,生产热情明显提高,各类合作社在民主政府的指导下,也得到了规范和发展,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走向欣欣向荣、繁华兴旺的新时期。正如曾希圣所说:“经过这一时期的艰苦奋斗,我们在巩固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完成了最艰苦的战斗任务,度过了最困难的相持阶段,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蓬勃发展。”^②

第三节 合作社成熟与壮大阶段(1944—1945)

1944年秋,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已逼近德国领土,太平洋美军也已打到菲律宾,日寇在国际上已完全陷入孤立。皖江抗日根据地军民抓住战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从1944年冬起,七师即向敌伪薄弱部分广泛出击,先后攻占了张家疃、塔桥等十多处敌伪据点,缴获许多弹药武器。1945年3月,三

①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50.

②《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235.

师独立旅奉令开抵皖江地区，归七师建制，独立旅的到来使皖江地区反攻日寇的实力更加雄厚。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作战，新四军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立刻转入大反攻、大进军，先后解放了无为城、凤凰颈、襄安等敌伪重要据点四十多处。^①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在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这一时期，由于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战局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经济上相应地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在多年的发展和巩固后，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

合作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无为、湖东合作社为人民谋利，发展迅速，1944年，无为共有3个生产合作社、14个消费合作社，股金总数达到1000万，社员总人数接近3万人，占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湖东共有消费合作社10个，股金总数达到200万，社员总数近1万人。^②巢县槐林区1945年就有100多个互助组。^③互助组、变工队成立后，干事有条理，没饭吃的人也得到救济，一些不好好劳动的人也转变了，连有残疾不能种田的皮匠也参加变工，别人做田他上鞋。

合作社资金来源得到了保证。根据1944年5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临江县陡沟消费合作社资金来源渠道是很广的，资金总计已达到500万元，三分之二为民股、三分之一为政府及各抗属投资。社员的股金除现金外，也采用劳力或粮食投股的办法，其中以劳力投股者达500余农民。由于合作社经营得法，其强大生命力已为群众所看见，不仅根据地群众入股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还吸引了一些居住在敌占区的绅商前来投资。

合作社在信用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944年吕惠生在参观合作社时就指出：“主要是食盐起了作用。民间信用极好。”^④据记载，合作社销售的食盐价格比敌占区低30%以上，且供应量充足。这种“平价保供”的运营模式，使合作社获得了“民间信用极好”的口碑。在恍城区等合作社发展成熟的地区，食盐销售已形成“凭证定量、保质保价”的规范化运作模式，社员家庭每月都能够获得稳定的食盐配给。这种可靠的物资供应，使合作社在群众中树立起

①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27.

②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52.

③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44.

④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188.

“金字招牌”的信用形象。

日本投降后，面对新的历史形势，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和平、反对内战的大局出发，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做出了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让步，决定让出包括皖江在内的 8 块解放区，并将这些地区内的人民军队调往北方。为了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自 1945 年 9 月下旬起，皖江解放区内的党、政、军、群机关人员和新四军第七师武装部队共 3 万余人，先后和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皖江人民挥泪告别，经皖东开赴苏北地区。这一重大战略转移使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也面临重要转型与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皖江地区成为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区域，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也随之从以服务抗日战争为主转向以支持解放战争和推进经济建设并重的全新发展阶段。

第三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组织运作

第一节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类型

1943年由皖江行署颁发的合作社登记暂行条例,根据合作社营业性质和服务内容,将合作社分为三大类型: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及运输合作社,并规定有7人以上就可成立生产合作社,21人以上即可成立运销或消费合作^①。

一、生产合作社

1940年12月,《抗战日报》发表社论《合作社应向生产方面发展》,指出合作社应该向生产合作运动方面发展:“首先,可与日寇进行经济斗争,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可供抗日根据地内使用,解决军民生活日用,支持了长久抗战;其次,战争使许多手工业工人及离开城市的技术工人失业流入农村,大力发展生产合作运动,可吸收这些技术工人参加生产,既解决了失业工人的问题,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技术保障,有助于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再次,手工业生产将农产品加工,提高其价值,可激励农民的生产热情,也可使市场活跃,输出品增加,达到对外贸易平衡,巩固根据地金融”。^②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区党委以及民主政府响应号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提出了生产是基本办法的方针。^③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一经成立,即确定生产合作事业为合作社的第一业务方针,“要使群众生活得到真正的改善,只有组织群众的劳资合作,发展根据地的生产,达到自足自给,才是正确的业务方针”。^④皖江抗日根据地地区党委要求各地区领导者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形,制定各区社的发展计划,以资向导。不论区社与乡社都组建适宜的生产合作社组织。

抗日民主政府首先将根据地“四匠”(铁匠、木匠、皮匠、泥瓦匠)和集镇上的妇女组织起来,制鞋、织毛巾、做纸浆、家具等,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来源问题,而且繁荣了地方经济,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在广大农村,政府引导有手艺的农民,从事传统手工业生产,加工铁、木、竹器和农副产品。

①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48.

②合作社应向生产方面发展[N].抗战日报,1940-12-04(01).

③《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63.

④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2)[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535.

一时，根据地内手工业生产十分红火，从业人员也迅速增加。这种合作社既是生产组织，又是经济组织。

由于各根据地普遍缺乏布匹、棉布等，华中局指出：“各地对最缺乏的布匹、药材及其他必需日用工业品，要尽可能做到半自给到完全自给，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有计划地开展植棉和纺织运动，要更实事求是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组织劳动互助”。^①在敌后抗战的艰苦环境下，发展农村手工纺织业面临着日寇频繁扫荡的严峻挑战。为此，根据地采取了组织手工纺织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模式。这种分散化、小型化的组织能够灵活应对敌人的扫荡。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于皖江第二届参议会中通过案由，决定尽量多组织手工业特别是纺织合作社，“有计划地发动人民的纺织事业，改良纺织技术和工具，做到农村布匹的自给自足”。^②纺织合作社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得到普遍开展。

此外，七师自组建以来始终面临着武器弹药紧缺的困境，尽管通过战争缴获和贸易采购获得部分补充，但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因此，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决定自力更生，通过互助合作在根据地逐步建立起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兵工厂。七师所需军用品，如枪套、子弹带、马鞍基本大多是依靠合作社解决的。

二、消费合作社

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当局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鼓励民间大力发展合作事业以推动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内，区党委及民主政府也十分注重消费合作社的发展。1944年，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在无为湖东半年来合作社工作经济总结中指出：“同时也应照顾群众的消费问题。因此合作社要按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去发展，其业务以发展生产为主要，目前在原则上规定用资本百分之五十去发展生产合作事业，另百分之五十为消费营业上流通”^③。

1941年春，巢县银屏区金家桥率先成立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首个消费合作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45.

②《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90.

③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2)[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535.

社，次年，大岭村增设了一个消费合作社。随后，1943年，巢湖东部地区迎来了消费合作社建设的高潮，先后在大潘村、沐家集、槐林嘴、牛家坑建立了四个消费合作社，其中大潘村消费合作社作为总社。到1944年10月，仅无为和湖东两县消费合作社就发展到24个。其中湖东县10个，合作社的股金总额219.14万元，社员人数9421人，占湖东县全部人口的1/15和总户数的1/3^①。此外，各地还建立了数量更多的小型消费合作社，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合作经济网络。

消费合作社通过各种渠道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从敌占区采购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有效缓解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困难。巢南山区盛产的竹、木、茶、麻、柴草等需要出售，同时还需要买进粮食、食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在集市贸易中，农民经常受到不法商人的盘剥。为此，根据地内的消费合作社将区内竹、木、茶、麻、桐油、柴草、药材等从农户家中收上来，运往边区集镇出售，然后再从境外购回粮食、食盐、布匹和日用品，加上应缴税金和成本及少量利润后卖给农民，比不法商人价格低得多，既满足了群众生活需求，减少了群众支出，又确保合作社自身得到发展。

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处处长叶进明多年后指出：“这种消费合作社就是军、政机关干部为了响应党中央‘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而成立起来的福利性质的合作组织，如机关干部大家凑钱买鱼苗，在山沟里掘池养鱼。干部与战士共同劳动，有时也可以换工劳动，勤务员代首长为合作社劳动，首长替勤务员做勤务工作，收获的劳动果实，实行公平合理的分配。这样做的结果，使得许多党、政、军机关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也改善了上下级的关系”。^②

三、运输合作社

由于根据地生产不断发展、人民需要不断增加、物资流通任务加大，而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军事封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采取了很多办法来缓解运力不足的现象，客观上促进

①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铁军文化研究新四军和安徽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研讨会论文集[C].2011:316.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2)[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566.

了皖江抗日根据地运输合作社的发展。

1944年皖江抗日根据地第二届参议会决定：每乡成立一个贩运农产品、供给消耗品的运销合作社。^①随后，皖江抗日根据地便普遍开展组织运输合作社或运输队。运输队主要是利用零星多余的劳动力，所以一般人数组织的多一点，如每天运十担盐的任务就组织能运三五十担盐的人，以便农民轮换，抽空余时间进行运输，不妨碍农业生产，同时由几个农活少可以经常干运输的农民作为运输队的骨干带动大家。据统计：无为有四个乡组织了贸易运输队，以运盐为主。全队共有八十一辆小车和一百一十六个挑子，分为十五个小队，共二百七十多人。据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统计，运了一千五、六百担货，平均每担八十元，共计获得十二万元的收入。^②

开始时，运输队只是一种自流松散的小队，敌军有可能随时来捣乱，与运输站也没有取得稳定联系，因此常常出现货少人多的情况。村民商讨后决定组织统一的运输队，各乡成立一个乡运输队，选出正副队长，负责领导，又与运输站签订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发运输证，保证运输队员资格，防止坏人捣乱，使运输队逐渐走上正轨。

四、其它类型合作社

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因地制宜，还建立了药材合作社。无为县境内盛产中药材资源，品种多达六十多种，其中包括桔梗、苍术、光古、半夏、明当、参药材。抗战爆发前，芜湖、南京等地的商人曾贷款给本地药商设厂收购，但由于山地主要由少数人占有，广大群众并未从中获得较多利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药材无人收购，废弃在山野之间。为重拾药材产业，无为县政府于一九四三年贷款十五万元给二百多户贫苦群众，成立药材合作社，广大农民于一九四四年春挖药折价还款。^③合作社大量招收民股（每抗币八百元为一股），在官沟沿、张家山、任家山各设药厂，就地加工成中药，群众极为欢迎，每日上山挖药的多至一千五百人，至少也有千人，会挖的一人一天可赚三四百元，即使妇女儿童每天也能挖到价值二百元的药材。^④各药材厂均有当地群众自己组

①《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90.

②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54.

③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55.

④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铁军文化研究新四军和安徽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研讨会论文

织的挖药小组，有效密切了药农和合作社的关系。药农可以随时采挖，随时销售，根据自身情况兑换生活费，其余部分则按当日采挖药材的市场价值折算入股，或选择以劳动投入方式入股，这样既解决了药农有药卖不掉的困境，又确保了药农能分到较高的红利。合作社也可不因资金困难而影响业务的发展。与此同时，药厂也改变了其原本的作用，成为合作社收货制晒部门，此合作社创办时间不长就收到晒干制好的草药一百余担。^①

第二节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管理原则

一、坚持民主原则

1943 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至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通过群众，选拔那些受群众尊重、生产积极、有能力的人担任”。^②吕惠生指出：“组织中基本要有骨干，组长社长指导员等，这些人必须大家选举，郑重其事，万不可用指定”。^③根据地内的合作社纷纷执行该原则，由群众投票选举合作社领导班子。合作社一般设经理、会计、收货员和营业员，总数是 4 至 5 人，这些工作人员皆由民主选举产生。境内居民年满 18 岁者，不分党派、职业、性别、宗教、种族（除有精神病者，有通敌行为，破坏抗日民主政府抗日军队行为，或抗日受民主政府刑事处分者外），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④选举的办法是：被选举的候选人背向群众坐着，脖子上套一个小筐在背上，再给选举人每人发一颗蚕豆，选举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把蚕豆投到要选举的人的小筐里，得蚕豆最多者当选。群众热烈赞扬这种新型的民主选举，专门编了民歌：

小豆粒，圆又圆，
拿在手里沉甸甸，
丢一粒，想三遍，
劳动称模范，
工作又积极，

集[C].2011:317.

①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55.

②把劳动力组织起来[N].解放日报,1943-01-25(01).

③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62.

④《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70.

这样的人我们才能选。^①

合作社领导班子，除了上述专职人员外，还有一个由政府领导、各抗日团体负责人及社员代表共同组织的理事会，专门监督专职人员工作。另外，还设有社员大会，由专职人员定期向全体社员报告经营情况，并征求改进意见，“社员代表大会有权开除不良的社员，对不合格的合作社干部也有罢免的权力”“社员代表则是以村为单位，由社员小组直接选举。社员小组在选举代表前，合作社对社员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向社员解释举行代表大会的意义，并且征求他们对合作社的意见”^②。这种较为民主化的组织机构，密切地联系了广大群众，增强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社员们都把合作社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爱社如家，生产自觉性高，经济效果也很好。

二、坚持自愿原则

合作社是典型的群众性经济组织，其根本宗旨是服务群众生产生活。自愿加入原则是马克思合作理论中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也是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

吕惠生在指导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时指出：“要自愿，但非自流的。老百姓真懂时，就完全干起来了”。^③对农民进行“说服教育，加以推动，自动自愿，由民主达到集中”。^④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自愿原则，根据地基层干部在宣传合作社时，从不进行强迫，全凭民众自觉自愿，通过入社让老百姓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未入社的群众看到入社的好处，人们入社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这样也就形成了先入社的带动后入的，群众纷纷入社的现象。1942年无为县大槐红色地区在党组织和政府积极倡导下，广大民众自愿结合了20个换工队。由群众自愿入股成立的合作社，因其建立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组织成立后十分巩固，运行过程中也很少出现问题。

三、坚持平等原则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变工是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进行的，闲工换闲工，一工

①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3.

②贯彻合作社民办政策[N].解放日报,1942-09-08(01).

③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48.

④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61.

换一工，闲工换忙工，两工换一工，半劳力（妇女及十六，七岁的少年）两工换全劳力一工。根据每人在某种耕作上的劳动效率，进行折工。例如，一般成人栽秧为六行，未成年的劳动力在挑东西上只能算半劳动力，但栽种却能栽五行，这时可折八毫工。犁、耙一亩田，换闲工两个，忙工一个。如田多，换不了工，可按当时工价给钱。^①

劳力支配则一般根据生产需要，分轻重缓急，由队长统一支配。谁家生活紧就替谁家先做。未订这一制度之前，曾有一度争执，家家都想先栽，大家都说：“早栽黄秧早得吃，早养儿子早得力。”^②最后决定谁家秧深就替谁先栽，并且实行滴水栽秧（因栽秧需要水浅，栽下后要水深才易活），即先从低田放水粮，栽高田时，将水放往低田。薅草时，则以低田先薅或谁的田先干就替谁先薅。服从队长分配，队长根据每日各家需要耕种的田亩进行支配，但需在全村劳动力限度以内，例如该村有 20 余劳动力，每日栽秧不能超过 30 余亩。并规定平时换工，各吃各的，农忙时换工，谁请工就在谁家吃饭，蔬菜先商议好，使各家都一样。工具，牛力实行互助，工具如有损坏，无工具者贴补修工具的工资，有工具者贴吃食，有时亦不一定，如水车损坏，有工具者负责修，大家贴桐油。^③

在合作社组织中，实行民主平等的治理原则，所有成员——包括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营管理层及普通社员——均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利，共同为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任何干部（党员）参加了，应完全守其纪律，不准有特殊化，一切公允为宜。^④另外，“无论贫农富农，均可加入此组织，个别知识分子（相信这个的）也可以参加，从事登账教育等工作，工具、牛力、人力均可加入作为劳力计算”。^⑤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吸收了各阶层人民（包括小商人）从事组织合作社，使合作社成为包括各阶层联合的组织，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的经济结构。

①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3.

②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3.

③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8.

④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63.

⑤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261.

第三节 合作社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一、合作社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虽不断发展壮大，但早期，由于合作社运动在此地区历史尚短，缺少经验，干部思想上对合作社运动的认识尚未完全打通，广大农民在思想上对合作社认识不足，导致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众多问题：

（一）民众中存在错误的认识，态度消极。农民对劳动互助还是不太习惯，如农谚云：“宁伙过年，不伙种田”。1944年关河区民主乡谢家塘洼全体换工队员总结了全年的生产经验，其中许多人以为：“已经动手车塘耕地，政府又来替我们订计划，组织换工队，真是多管闲事，做庄稼谁不会干。政府要我们增开十亩荒，无非是欺骗我们代劳，特来好一把拿去”。妇女们则认为，生产计划中把纺车订上，一定是“政府要送棉花皮子给我们纺的”。因此不敢报纺车架数，以后各家攀扯起来，你订上我就订上，才都写上了计划。订了计划之后，都认为“政府要我们增加收获量和多养牲口，一定不是好事，恐怕是什么点子”。懒汉赌鬼费荣珍认为“现在还弄个婆奶奶管住了，不要我抹牌，真急煞人！”穷苦贫农胡一有的想法则是：“我家里只有1亩2分地，要我们组织换工队开荒生产倒是巴不得的事，我参加换工队多做了工，还怕别人不给工钱啦”！^①另外，在民众中存在着冷热病和依赖性，督促松些就发生自流现象。特别是在筑工事过程中，几乎停顿了换工，谁能抽空回家，就着急先做自家的事^②。

（二）合作社工作人员工作素养有待提高。在1942年之前，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建设呈现出明显的战时特征。这一时期的合作社主要承担着为根据地政府筹措经费的职能，而非以改善群众生活为首要目标。在管理体制上，合作社干部普遍实行政府委派制，缺乏民主选举和群众监督机制。这种管理模式导致部分干部出现官僚化倾向，将合作社这一群众经济组织异化为行政机构，严重影响了合作社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制约了其服务群众功能的发挥。有些工作人员态度傲娇，服务态度比商店人员还凶，经理高高在上，不尊重社员或理事的意见；有的合作社干部能力不足，缺乏商业头脑与专业技术，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不能灵活运用原则，造成营业方式死板，加之不理解合作社的意义，

①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5.

②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6.

使合作社成为政府机关的供给部，把合作社当作是官办或官民合办的股份公司^①。另一方面，许多合作社干部甚至不了解财政经济工作是敌后根据地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轻视这些工作或者认为其只是一种技术工作，许多同志不愿意或不安心担负这种工作，认为这种工作做久了没有好的前途。^②

（三）宣传不普遍、组织不深入、领导上的空虚，亦是较严重的倾向。据1943年统计，皖江抗日根据地在去年秋收运动中，虽然已组织了十余万群众，但实际检查起来，尚未实现组织根据地基本群众大多数，有好些农民、妇女、儿童等未参加群众组织。^③且有的换工队尚无组织，又由于记工不严（不一定还工，只讲吃喝和只讲感情），因此没有普遍进行，只限于感情较好的几家进行。在合作社方面，有的合作社组织形式上庞大复杂，但内容空虚，不适合战时条件；有的合作社未召开过社员大会或代表会，有的未组织理事会，空有合作社名称，而无社员群众；有的不是理事会而以董事会来代替，股票不记名，与资本主义下的股份公司无异，没有组织群众的作用；有的合作社虽成立了理事会，但理事中竟没有一个抗联主任或农抗理事来参加，纯是镇上小商人，对合作社毫无认识，甚至有反对合作社的。^④

（四）缺少公私兼顾的责任心及为群众服务的精神。皖江抗日根据地一些合作社与货检机关关系不好，甚至秘密偷税，对联营社工作，缺少协助配合的观念，不清楚联营社是执行公家的贸易任务，只顾合作社本身狭隘的眼前利益^⑤。在合作社实际运营中，部分干部服务意识淡薄，没有将发展生产、在经济上组织教育群众作为首要任务。还有部分干部将合作社简单等于商业机构，局限于买卖赚钱和供应必需品。更有甚者，一些合作社完全偏离了服务群众的宗旨，将单纯盈利作为唯一目标。虽然办得很久，供给消费却没有能很好地购办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社员群众仍只得去买较贵的食盐，有时食盐缺乏，也未照顾社员购买，社员甚至不知道股票可以购买廉价食盐。

（五）一些合作社在成立和运营过程中，个别干部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和浪

①《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50.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169.

③《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14.

④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2)[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533.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880.

费，表面上打着“为群众办合作社”的旗号，实际上却中饱私囊、腐化堕落，将合作社的资源用于个人享受。在皖南支队无东大队中，以公款 2000 元未经批准借给下层干部；皖南支队无南大队教导员陈恒昌，以公款在敌据点开行做生意。^①出现资金困难后便搞摊派，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仅未能实现改善民生的初衷，反而加重了群众负担，导致干群关系紧张。部分群众对合作社产生抵触情绪，甚至认为合作社的存在弊大于利，这种信任危机严重影响了合作社的群众基础和组织效能。

二、合作社面临挑战的应对对策

针对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皖江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民主政府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在之后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改进和调整：

（一）加大宣传，动员各阶层群众踊跃参加合作社。“财政经济工作是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是一个要求广大人民踊跃捐输，努力生产，帮助政府抗战的群众组织工作，要把这个工作进行得好，光靠政府来做是不行的，一定要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来做，把每一种的财政经济工作都造成与群众血肉相连的（热烈）运动”。^②皖江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民主政府积极动员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合作事业，指出未经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的地区，党要用极大力量去组织群众。^③根据地干部广泛深入到每一个村庄，进行宣传动员，出布告，发文件，这些布告文件和报纸散发到每一个机关团体、每一个村落集镇和交通要道内，必要时区党委甚至成立专门的宣传队，向广大人民宣传入社的好处。为了鼓励群众积极参与供销合作社，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在合作社成立前积极开展宣传，向群众阐述加入合作社的四大优势：（1）摆脱私商的剥削，保障自身利益；（2）享受货真价实、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3）获得种类丰富、品质优良的商品供应；（4）定期享受合作社的分红收益。口号简明有力，反映了群众的期望，赢得群众支持。一经宣传，群众积极拥护，每户投资 1-2 股，每股一元（银元或流通币）。^④组织读报工作实为深入宣传的重要方法，读报人

①无为：无为市档案馆，1-13-1963-Y-1-0020:122.

②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20.

③《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13.

④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50.

员选择最重要的以及和群众最密切联系的新闻加以讲解，以此加深广大群众对民主政府各种政策的认识。^①各区委和区、乡政府，也常在驻地召集各界人士开展座谈会，讲形势，讲政策，征求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了解群众的心理。

（二）贯彻官督民办的方针。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的《贯彻合作社民办政策》指出：“陕甘宁边区合作事业，自今年春实行民办政策以来，股金由人民自愿筹集，社务与业务均由社员自行管理经营；政府只负责从旁协助，使合作社更与广大民众密切联系，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上面的事实证明，民办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全部实现民办政策，才能使边区合作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②是年，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在合作社总结会议上指出：“合作社的组织彻底群众化，由群众来组织，又为群众来服务，使群众在观念上认识到合作社。群众动手，政府帮助，纠正群众那种恩赐观念，反对公家包办、官办的作风。实行民选，由群众自己选好人来办”。^③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权力交还给社员，由群众投票选举代表管理，确保合作社的运营符合社员的利益与意愿。

（三）重视合作社干部管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彻底摒弃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选拔使用人才方面实行的“任人唯亲”的错误路线，坚持“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方针。^④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处对财经干部的选择非常慎重，不随便地凭着一纸八行的推荐信，就加任用。一扫过去轻视青年的错误心理，大胆地任用青年，信任青年，以工作来教育青年。皖江区党委和民主政府大力加强对合作社干部的管理与业务学习。

“经济工作是一项最艰难、最实际的工作，我们的同志很少有这种修养与经验，因此工作中困难很多。今后应动员同志——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注意对这一工作的学习与研究”。^⑤民主政府多次举办训练班，组织财经干部学习中央政策及财经处编写的各种手册和先进典型事例、召开讨论会，开展自我批评，相互进行生活的工作检讨，提高合作社工作人员的素质。

① 《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 皖江抗日根据地[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163.

② 贯彻合作社民办政策[N]. 解放日报, 1942-09-08(01).

③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档案馆.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2)[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535.

④ 房列曙. 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 71.

⑤ 《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 皖江抗日根据地[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83.

（四）健全合作社的组织与管理。傅秋涛曾在七师参谋会议的总结上指出：在制度方面，过去是毫不讲究的，特别是在经济制度方面一片混乱的现象，是无所谓制度，物质要求，发财思想形成严重现象。^①因此，把经济制度严格起来，特别是纪律制度要抓得紧，这是当下最主要的工作。^②为了适应大办合作社的新形势，1941年皖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皖中财经委员会，选派了谙悉财经工作的唐晓光、后奕斋、林立等人担任委员会正副主任。1943年1月，皖江抗日根据地成立合作事业指导室。在合作事业指导室中建立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的人选一般为规定的五人至七人，以县长（或办事处主任）、政府有经验之科长（如财粮科长）、县委书记或熟悉地方情形之负责同志、抗联主任与指导室主任等组织，指导室主任一人及干事一二人，成为政府之一部分，受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去指导合作社的组织问题，业务问题。

（五）大力惩处贪污腐败现象。为努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吕惠生主持制定了严厉的《惩治贪污条例》。条例初期规定贪污300元以上即处死刑，由于涉案人数过多，难以落实，便将死刑标准上调为1000元以上。对于1000元以下的贪污行为，则根据情节轻重，施以惩罚。无为县俞村合作社有三个干部合伙贪污公款二十余万元（比1941年币值要缩小一百倍），判处已较轻，除令其全额退赔外，对主犯判处五年徒刑，另外两名从犯分别被判处六个月和三个月有期徒刑。^③另外，按合作社组织条例草案规定执行，将原来政权机关工作人员的薪水制逐步改为津贴制、分红制。在抗日民主政府对贪污腐败现象大力惩处下，根据地内逐渐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所谓牢不可破的贪污浪费现象，是逐渐减少了。

经过整顿，皖江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底以后，合作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仅数量增加，管理水平也有了可喜的进步、合作社的营业内容也更加全面，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也得到了保证。”^④

①《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86.

②《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96.

③施昌旺,王敏林.吕惠生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60.

④陈家骥.抗战时期皖江根据地的消费合作社[J].历史研究:19.

第四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贡献

毛泽东曾指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①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合作社在战时环境下所发挥的多元功能：在经济层面，它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在政治层面，它强化了群众动员；在文化层面，它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在社会层面，它实现了基层治理创新。这种多功能协同的组织形态，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第一节 促进经济发展

一、推动农业生产发展

皖江抗日根据地地处农村，主要的生产是农业生产，发展农业是解决根据地财政经济问题的主要办法。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组织形式，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劳动组织把散漫的个体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农业生产的一次革命，是农村社会经济的萌芽。

通过变工、换工等互助合作形式，有效解决了农忙时劳力、畜力缺乏的矛盾，提高了农民生产热忱。变工互助由于是集体劳动，村民的劳动情绪显著提高，“一人开荒，像鬼钉楂巴，越钉越熊，干干黄烟，扯扯闲淡，一天就过去了，大伙儿在一起，就越干越有劲”。“一人栽秧，看看还有一大片，就懒得干，早歇了工。早上也懒下田，人也格外容易累”。^②换工只要大家下毫（一点点的意思）架子，日头下山以后，还能栽几亩田，人还不累。此外，集体劳动由于有劳动纪律，也节省了工。例如：开荒1天，规定只能吃3遍黄烟。又如，以前请短工来家做生活，日头上山才上工，太阳未落山就下工，现在则起早摸黑，这样每人3天就可节省1天。换工还可以把闲散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此外，换工生产还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谢家塘洼村以往全村栽秧要7天，实行变工互助后，3天就栽完了，期间还抽出35个人卖茶叶，净赚2100元，还用12个工替陈家山洼村栽秧，得工资600元。开展农业互助还改善了皖江地区的农业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7.

^②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4.

环境。1943 年冬和 1944 年春，根据地在白渡镇的孙庄、螺丝滩两地试点组建了两个变工队，共吸收 130 余户农民参与，有效解决了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成功开垦荒地数十亩，使许多荒山野地变成了粮仓，收稻谷二三百石。

二、加速工业经济发展

曾希圣曾经指出：“皖江抗日根据地地区富庶，农业不成问题，要紧的是工业，这也不是办大工厂，而是发展家庭工业。农业需要的是保护，使不被敌人抢得过多，少受损失。生产中心应在工业方面”。^①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有效推动了根据地的工业发展。

1943 年夏，由于日商疯狂抢购棉纱，造成棉布价格高涨。战前农民以一石米可换到 10 丈洋布，到 1943 年时，一石米还换不到 2 丈洋布，而且很难买到^②。针对此情况，华中局指出：在今后日寇加紧封锁之条件下，我根据地军民可能遭受重大之困难者将为布匹材料及日用必需品之供给（军用品除外）。^③1943 年秋冬，皖江抗日根据地便因势利导，于第二届参议会通过案由，决定“有计划地发动（展）人民的纺织事业，改良纺织技术和工具，做到农村布匹的自给自足”。^④为了保证纺织业的发展，民主政府决定：“鼓励人民多种工业原料，如种棉花、烟叶、桐子，漆树等，达到我根据地有五万亩至十万亩的植棉地”^⑤。在此期间，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纺织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无为县总工会举办的工业产品展览会上，南苏区石玉凤发明的浆纱经纱机，两个人一天能经布 80 余丈，超过普通经纱机的 4 倍；恍城区的 40 根头的纺纱机，每天能纺纱 5 斤以上，超过普通纺纱机数十倍。^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棉布价格增速逐渐放缓，根据地内逐步实现了布匹自给。

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在根据地，发展大工业是很困难的，发展小型工业是当时最急需的、最现实的步骤。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引领下，根据地各小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涌出。1944 年，在繁昌成立了一个有十几台织袜机的

①《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63-64.

②程必定.安徽近代经济史[M].合肥:黄山书社,1989:345.

③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54.

④《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90.

⑤《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90.

⑥郭万清,朱玉龙.皖江开发史[M].合肥:黄山书社,2001:239.

小厂。1945年春，皖南专员公署又办了一个有六七台纺织机和12台布机的织布厂，并与繁昌袜厂合并组成针织纺织联合工厂，还办有40多人的造船厂，制造了二三十条小型木船。^①1944年，在和县功剩桥一带，分散开办的弹棉花、织布、纺纱、鞋袜、毛巾、皮革、油漆、纸烟大小工厂九个。团山里一带有师部被服厂，围绕被服厂还建有织布厂、皮革厂、弹棉花厂、染布厂。巢南开办了香烟厂、副食品加工厂。和含地区也办起了纺织厂、卷烟厂等小工厂。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在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多重效应：其一，有效保障了战时军需物资供应和民用商品供给，显著改善了根据地民众生活水平；其二，创新性地整合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既维系了传统家庭生产模式，又通过组织化方式将老弱妇孺等潜在劳动力纳入生产体系，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三，构建起农业与手工业良性互动的产业格局，形成了“以农促工、以工补农”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助推商业贸易繁荣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日本开始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侵略，并实施以战养战方针。驻芜日敌在芜湖采取商业垄断，实行贸易统制、限制货物外流、对居民实行定量配给等措施。他们开设有三井洋行、三兴洋行和盐冈洋行等，强行推销日货，大肆抢购粮食和军需物资，并开设扬子公司、铁记运输公司，垄断水上运输。这些分支机构，以芜湖为中心分布在与皖江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各乡镇。面对严峻形势，皖江贸易总局积极开展反封锁、反掠夺的贸易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七师和民主政府充分利用皖江抗日根据地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他们制定了“对内自由，反对垄断，对外管制，反对自由”的方针，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此时，合作商业是根据地商业的主体力量。

皖江抗日根据地对外贸易主要有三条渠道，其中一条便是组织群众成立合作社，控制重要物资的进出口。根据地为了保护资源，防止日伪掠夺，对各类物资视其重要性区别对待，分别管理。合作社要求产品尽量内销，调剂内部市场，保证根据地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和战争资源。只有消费剩余和非必需的产品才允许出口。此外，合作社还对粮食实行统制，对敌人所需要的军事物资严禁

^①郭万清,朱玉龙.皖江开发史[M].合肥:黄山书社.2001:237.

输出，并抵制日货及一切伪国货，抵制奢侈品，鼓励商人往后方采办国货，要求商人运出根据地多余的土产品，运回根据地所必需的货物。

食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在抗日战争时期，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食盐全靠苏北沿海经敌伪区运来。在日军长期封锁水陆交通的情况下，根据地人民买不到食盐，除少数富商外，绝大多数人家常年吃淡菜。有些离乡做小生意的农民，用近 100 个鸡蛋冒险进入敌占区换来一斤盐作为病人调养身体和招待客人之用。当时有人感叹：“黄金有价盐无价”。据 1943 年资料记载，庐江县物价评议会评定部分物价：熟米每担 600 元，糙米每担 550 元，小麦每担 650 元，面粉每百斤 800 元，纯大盐每百斤 3400 元。^①合作社干部便选择从食盐管理入手，在中路设立盐务管理局，统一收购食盐，加强食盐管理，这打开了皖江贸易发展的突破口，疏通了沦陷区贸易渠道，保证了根据地的食盐供应，平抑了长期降不下来的盐价。而且，合作社售卖的食盐价格比市价每斤便宜五、六元。根据无为县联营社半年对合作社销售食盐数统计为 90.1092 万斤，如以每斤便宜 6 元计算，则群众得利多达 540 万元以上。并且买卖公平，正如当时根据地内妇女们所说“合作社的盐，不但便宜而且干净，又不要还价，傻子去买也不会吃亏”。^②

皖江抗日根据地通过合作社组织，掌握了主要的农产品。他们在贸易总局的指导下开展经济斗争，争取有利于根据地的交易。当某种农产品被压价时，就封锁不卖，价格上涨时就积极出售。从而减少商人中间剥削，使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第二节 改善民众生活

一、救济灾荒

救济灾荒是合作社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合作社履行社会职责的重要体现。多年来，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内，蝗虫繁殖迅速、蔓延广泛，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威胁。1945 年 5 月初，巢无地区发现了大面积蝗虫，巢南山里蝗虫幼虫与卵在地面堆积有三、四寸厚。当时正值春耕，插秧在急，群众抽不出劳力灭蝗。

①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657.

②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铁军文化研究新四军和安徽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研讨会论文集[C].2011:318.

为了确保粮食生产,保护群众利益,皖江区党委于5月14日及时发出了《关于动员群众扑灭蝗虫与帮助群众春耕的指示》,号召巢无、湖东两县实行县与县之间的大变工,以村为单位,组织灭蝗小队,开展村与村、乡与乡之间的灭蝗竞赛。由皖中行署及皖江抗联负责组织、进行调剂,以完成扑灭蝗虫和春耕插秧任务。

针对蝗灾严重地区,民主政府就在邻近区乡动员群众参加灭蝗。发动群众之间竞赛,村与村之间竞赛,这不仅提高了灭蝗效率,还形成了先进带动后进的良好氛围,实现了全民参与灭蝗。石涧区龙王乡灭蝗的方式是把一甲编为一小队,由干部带头,在天还未亮之前就吃饭,天亮之后上山打蝗(早晨蝗虫集中,待太阳出来后蝗虫就会分散),中午后回家做田。石涧区青苔乡群众捕蝗的办法是:春耕大忙时,优先安排青壮年劳动力留在田间从事主要生产任务,派50岁左右及16岁以下的半劳动力去打蝗虫。既保证了春耕的顺利进行也消灭了蝗虫。^①负责灭蝗虫的单位,每天在休息前会集中进行一次群众座谈会,重点讨论当天灭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后应注意的地方。在下山时总结一天工作,进行表扬与批评,并帮助外乡打蝗者解决生活困难。^②在皖江区党委及七师部队的重视和帮助下,16日至20日,巢南山区每天都有上千人上山灭蝗,很快将蝗虫扑灭,减少了农业损失。

皖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是无为县东乡长江黄丝滩江堤的退建工程。这段江堤历史上溃堤成灾次数最多,是近百年来统治者不敢问津的浩繁工程。在皖江区党委及民主政府的领导下,1944年5月汛期前,黄丝滩江堤退建工程竣工,共计动员民工20余万,历时211天,挑土40万方,筑成了长13华里,高2丈、底宽12丈的大堤。^③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黄丝滩工程“不仅在皖中是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④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为此撰文,热情赞扬说:“规模的宏大,成绩的优异,出乎人们想象,这是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更是敌后水利建设中的一个新创造、新纪录。”^⑤工程得以迅速完成的原因众多,其中一条主要原

①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57.

②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3.

③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3.

④华中各地兴修水利皖中黄丝滩大堤竣工[N].解放日报,1944-05-30(01).

⑤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3.

因便是根据地人民突破了传统地域观念的局限，充分发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尽管兴建大堤工程对江南、江北部分县区的群众缺乏直接利益，但在党的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下，他们深刻认识到水利建设对根据地整体发展的重要性，自觉打破地域界限，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此后，繁昌县还组织高安、孙村等地农民，修建了沿江大闸的高安闸、修固了九连圩。沿江行政办事处在晏塘乡西湖村兴建了长征圩水闸；在无为县，重修了受益田亩达 30 万亩的季家闸、黄树闸、陈家闸；在临江县，修塘 1002 处，坝埂 90 多道；在湖东县，开凿了大新圩山河，受益农田 7 万多亩，修筑大小圩堤 30 多段；在和含境内，兴修了白渡河水利工程。^①这些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充分凸显了，只有人民的力量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只有劳动人民的集体力量，才能创造与完成一项艰巨的建设工业。

蝗灾、旱灾以及水灾的及时有效地防治，使皖江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巢无、湖东两县连续两年粮食普遍增加二成，棉花、油菜籽增长 3 成，部分农户包括旱杂粮在内的粮食增长 3 成”。^②1943 年 10 月 18 日《解放日报》报道：“皖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彻底推行‘二五’减租政策及提倡垦荒兴修水利以来，生产激增，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市面日呈繁荣景象”。

二、提升民众生活水平

副业生产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根据地的副业生产以往基本是个体家庭式的，一般只能在农闲时才能得以进行。劳动互助运动开展后，提高了劳动效率，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为根据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孙家庄有 120 多户，共成立了 6 个互助合作组，每组十几户，生产时互帮互助，以工换工，以人工换牛工，解决了贫困户的耕作和耕牛缺少的困难，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农闲时，互助合作组织就把社员集中起来，搞编织、打绳子、开展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大江报》对孙家庄的互助合作

①房列曙.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242.

②中共居巢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居巢地方史(第 1 卷)1919-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227.

经验及其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专题报道，给予了充分肯定。^①

1945年，皖中临江地区干旱，粮食只收六成，但由于人民政府废除苛捐杂税、换工生产，不仅未造成灾荒，人民生活比旧政府的丰年还要好得多。旧政府时民谚说：“收不收过一秋”，意味着不管收多少，过了秋天就没有吃了。而这年情形则完全不同。以汤沟区提树乡石狮张村为例，该村共有63户人家，292口人，佃田和自田合计908亩。当年仅收获稻谷2100多石，比丰收年减少了1400多石。然而，在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引导下，村民充分利用资源，开展了多种经营。将村口的荒塘用来养鱼，预计可获利36万元；在塘埂上栽种柳树，并在荒地种植棉花，收获籽棉5担，收入35000元；在埂边种植栗子、黄豆等作物，收获20多担，收入150000元。过去村上一些好赌贪懒的人，在政府的教育和帮助下，合股养了3000多只鸭，也可得到38万元。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收入。

无为县新民区内河流纵横交错，滩地很多，为开发利用河滩资源，地方政府与地方贤达共同组建了河滩生产委员会，统筹指导沿河群众开展河滩圩埂综合开发。委员会遵循自愿原则，广泛动员群众入股，共筹集生产资金20万元。在数百亩的乌龙滩上，实施了菱角种植、莲藕栽培、水产养殖、芦苇种植等多元化经营，并大面积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大麻。得益于滩地肥沃的自然条件和较低的劳动力投入，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石涧区陈家闸，秋后河水退落，露出大小滩地100多亩，平日当作放牛堤，没人想到种东西，区政府召集河两旁村子里富有生产经验和热心生产的老农来座谈，组织河滩生产。共商讨出两种办法：一是群众和政府合干，群众得大头，政府得小头（政府获得利息做优抗基金），二是愿参加者入股，以劳动力为主，钱其次。滩地放藕秧、菱角、芦柴、药秧等，并在滩中划出一片草滩为牧场，据估计一年可收值120万元左右。^②

在合作社引导下，在集体劳动的影响下，皖江抗日根据地乡村副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农民生活逐渐充实起来、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据统计，无为县17个合作社中，除新成立的不计外，有9个合作社已分过几次红利，分红总数为

①中共和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和县地方史 1919-1949(第1卷)[M].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229.

②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71.

1984421 元，占分红股金的 53%，即群众从 100 元的股金中，收获 53 元的红利。湖东地区 10 个消费合作社，已有 8 个分过红利，分红总数为 584210 元，占分红股金的 59%。^①人民群众得到了切实好处，群众到处“都在忙着造屋、漆屋、修屋，屋子盖得整整齐齐，一摸光，一色新”。^②

第三节 涵养良好社会风气

一、促进妇女解放

“妇女解放必须通过民族解放、阶级解放而获得解放，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阶级解放是一致的，不是为妇女运动而运动，而是结合当时的政治斗争来开展运动”。^③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在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根据地内的各项工作被广大妇女理解后，她们都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她们把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结合起来，在大力冲破封建罗网、取得男女平等权利的同时，均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纺织合作事业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改善民众生活的重要方式，也是合作社工作的重要领域。广大妇女们心灵手巧，善织布，为了促进妇女纺织的发展，根据地的妇女组织把纺织运动作为当时妇女工作的中心内容，“各级妇女工作负责同志，帮助妇女订生产计划和组织纺织变工队”。^④通过将妇女群众组织到纺纱组和纺织合作社中，实现了纺织生产的规模化、组织化，各根据地逐步实现了棉布自给。

在各项生产运动中，不仅培养锻炼了一批能力突出的妇女干部，还巩固和扩大了妇女组织，有效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进程，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1944 年皖江抗日根据地搞民主政权建设，实行干部由群众选举的制度，县里成立参议会，好几个有威望、有贡献的妇女被选任为驻会参议员。在妇女工作中不乏佼佼者，临江县白茆洲的女参议员吕绍芬，热爱妇女工作，在妇女中积极开展拥军拥政、组织妇女从事副业生产以提高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平日深受群众爱戴。此外，在根据地民主选举中妇女也起到重要作用，

①陈家骥.抗战时期皖江根据地的消费合作社[J].历史研究:19.

②中共安徽省党史研究室.铁的新四军[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207.

③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236.

④《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84.

妇女最讨厌流氓强盗分子，反对叉鸡、收晒的（指专门偷晒在外面衣服的人），被妇女反对的人很难当选，一些很公正、有才能的就能被选为乡长等。

由于妇女广泛地参加根据地的各项运动和建设事业，提高了经济自立能力，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摆脱了对丈夫的经济依附。许多人称赞说：“媳妇会种田，公婆心里甜。”据鄂豫皖边区党委妇女委员刘芳回忆：“到1945年我们北撤之前，整个根据地的妇女扬眉吐气，在家里不窝窝囊囊的，说话算数，夫妇和气，婆媳和睦，很少吵架怄气”。^①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妇女的自身解放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解决。

二、改善社会不良风气

二流子是边区乡村社会的一大问题，是旧社会遗留的顽疾。这类人成天不劳动，还在动员工作中散布消极言论，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变工互助成功地改造了二流子、懒汉，并且使以前的一些鸦片烟鬼也开始转变，参加劳动。懒汉费荣珍以前赌的不归家，组织换工以后，就没有赌过，并且干生产也很下劲，4亩田收了7亩田的稻（前年是7亩2分田，该年冬季卖去3亩2分），现在还剩有10担稻，另收棉花40斤、山芋15担、茶叶3担，养1口肥猪、10只鸡，还赎回了典去的3亩2分田。这些收获超过前年的1倍，是他想不到的事。他转变的模范行为，感动了该村全体人民。村民改选他做换工队长，来领导全村今年的大生产。^②

巢县槐林区蒋家冲曾因赌博成风而闻名，村民终日沉迷赌博而荒废农事，导致大量田地撂荒，村民生活每况愈下。自民主政府推行变工队组织后，蒋家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村掀起互助合作热潮，仅一年时间就节省人工（忙工）1000余个，不仅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促进了村民团结，彻底根除了赌博陋习。

此外，经过合作以后，村民之间还增进了团结，村民开始关心村上共同事业。尚礼区尚礼乡南边丁村三十九户人家，人口199人，全劳动力32人，自佃田315亩，耕牛只有5条。以前该村一贯不和气，不管农活多忙都各干各的，因而造成田地荒芜，一亩田只收两担多稻，不少家缺吃少穿。区政府和抗联的

①邢献宝,政协无为县委员会.百年沧桑话无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56.

②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6.

同志在村上连开三次会，把干部和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不团结的事实摆出来进行教育，又替村上没吃的农户借粮食，发动大家合买了两头牛，议定栽秧时实行人力、牛力、工具的大换工，解决贫农无工具的困难。村民在换工劳动中展现出高度的互助精神，大家在心里想：“他把我干活起早摸黑，我替他干活就不能迟上工早下工”。^①形成了自觉的劳动纪律，村民之间增强了团结，农民的集体意识在合作中不断增强。

第四节 支援军事战争

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从 1942 年起，皖江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优抗工作是拥军工作最重要的一环，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扩军工作才能顺利开展，部队和根据地才能巩固。皖江行署对各级政府发出优抗工作的指示，各乡陆续成立优抗委员会，各保相继成立优抗小组。

抗属家庭由于丈夫或子弟参加部队抗战，家里种田缺乏劳动力。针对完全没有劳动力的抗属家庭，对他们采用包耕的方式；还有一部分抗属家里有人，但在农忙时缺乏劳动力，则组织代耕队代耕。如孙家庄在互助合作组的基础上，专门组织了代耕队，村农抗会理事长任队长，专门挑选了一部分强壮的劳动力，为军烈属和少数无劳力的困难户代耕。这个村有 7 口水塘，都划归代耕队集体养鱼，其收入一部分作为代耕队的劳动收入，一部分则用来解决军烈属和贫困户的生活困难。谢家塘洼村由于组织换工，原定计划替抗属代耕 13 个工，实际却代耕了人工 20 多个、牛工 9 个，慰劳鞋在完成任务之外，全村还多做了 8 双^②。延安新华社曾专题报道了无为县响山互助组的先进事迹：该互助组通过为军烈属代耕、制定生产计划等方式，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包耕与代耕普遍推行以后，人民生活有了保障，便对根据地产生了爱护之心。根据地人民都踊跃参加抗战活动，参军热潮在各地先后展开，妻送夫、母送子等事例到处涌现，槐林区仅四个乡，但在乡、村多个干部带头下，有 700 多名青年参军，1943 年加入七师的民兵占民兵总数的 15.2%。^③

①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9.

②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6.

③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88.

合作社的发展还保障了军粮的及时供给、战勤供应的顺利进行。每到岁末年初,根据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抬着精心准备的慰问品前往部队驻地。据统计,仅无南、无东两地人民就送来了 1000 余斤猪肉和鱼肉、500 多只鸡鸭、1000 多双鞋子以及大量日常生活用品。^①此外,随着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不仅满足了根据地内的军用民需,还大力支援了新四军军部。根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日记记载,1942 年底至 1945 年春期间,第七师向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第五师的资金支持达到 5300 万元法币(约合黄金 26.5 万两)。其中,1944 年 1 月至 1945 年 1 月间的资金贡献尤为显著,总额达 4100 万元。这一数额足以维持 20 个国民党甲级师一年的军费开支,是 1937 年 11 月至 1940 年 12 月间国民政府拨付新四军总经费的 20 余倍。除资金支持外,第七师还向军部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通讯设备,并不定期支援第二师、第五师的经费需求。按照新四军和华中局制定的财政分配政策,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实行“三三制”分配原则:地方政府、驻军和军部各占三分之一。据此推算,至 1944 年,第七师及皖江根据地的年可支配财政收入已超过 1.5 亿元法币。^②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的发展,为新四军提供了极大的物质支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抗日战争是长期持久而极其艰苦的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不动员全民族的人力物力财力,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都处于贫苦饥饿之中,他们就无力参加抗日救国,争取抗战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③除此以外,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支持抗属,保障了军人家庭的基本生活。这种关怀和支持极大地激励了更多的青年参军报国,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生动写照。

①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87.

②辛易.雨花忠魂忠贞吕慧生烈士传[M].南京: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78.

③王晋林.“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论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J].甘肃理论学刊,2004(04):109-112.

第五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建设的经验启示

在党政军的正确领导下，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在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区周围数十里的农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两旺，财源茂盛。^①其中，合作社无疑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有效促进了皖江地区的生产发展，更在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改善民生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成功之道也为新时代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之处。

第一节 坚持党政联动引领是合作社成功的根本保证

合作社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党中央、华中局以及皖江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为合作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七师政委曾希圣指出：“皖江抗日根据地取得的种种成就，首先，应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华中局和军部的直接领导。党中央和毛主席远在延安，虽然没有直接发钱发枪给我们，但是给了我们许多英明正确的指示。特别是当我们处在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依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增强了信心，取得了办法”。^②

此外，党和政府在财政、人力和政策等方面也为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帮助，有效推动了合作事业的顺利开展。从财政上来看，在合作事业指导室成立当年，政府便贷给各地大江币二百万元，帮助建立供销社。1942年，无为县政府一次下拨资金10万元，发放农业贷款7万元，以此支持农户发展生产。^③1944年无为县大岭乡在28个换工小组中成立了六个中心组，政府给他们无息贷款10万元，当年该地即增产细粮两万斤。^④从人力支援上来看，皖江区党委明确要求，要将有经济工作的经验干部调到合作社去。“在各根据地内须建有强有力的财政机关，要派最有工作能力及政治上最可靠的同志

①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13.

②曾希圣.曾希圣文选 1939-196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3.

③中共居巢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居巢地方史(第1卷)1919-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226.

④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铁军文化研究新四军和安徽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研讨会论文集[C].2011:294.

去负责，要征调大批好的党员及热情的男女青年去学习与从事财政经济工作。^①”1941年，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建立了干部训练班，对正副分处主任、分所所长以上干部进行轮训，每期三个月。1942年初，又办了两期青少年培训班，学员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也有的是领导干部的工勤人员，他们都是13-17岁的孩子，其中还有少数女生。通过培训班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管理骨干与业务尖子，使合作社干部清楚如何创建合作社、发展合作社，根据地逐步走上了科学的、专业的办社之路。最后，政府还出台了相关税收优待政策助力合作社发展。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暂行条例中就规定：“经登记备案之合作社得免缴捐税及必要时向政府请求贷款之享有各项规定之权利”^②，为合作社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党和政府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领导是坚定不移的，旨在确保农民合作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更好地服务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具体而言，应当着力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合作社的政治引领，深入推进合作社党建工作创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合作社发展始终沿着服务“三农”的正确方向前进。

第二节 尊重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是合作社遵循的基本原则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根本工作路线。这一路线深刻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在敌强我弱的革命环境中，通过实践探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也是党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根本方法。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组织将群众路线贯穿始终。1944年10月4日，在无为、湖东两县的合作社经理、理事长联席会议中，合作社干部提出：“合作社应该发扬民主管理的精神，职员应有群众观点，经常反映群众意见，解决群众要求，执行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办得好，发展一定快。——因为合作社组织是群众谋求改善社会地位与本身生活最有力的组织，而且也是群众最容易自

①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167.

②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48.

己来管理和指挥的组织形式”。^①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在办社过程中，始终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行自愿入社、自愿退社的政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和政府包办。通过耐心说服和典型示范，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合作社的好处，自愿加入合作社。此外，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合作社内部设置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三个机构。社员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社员组成，负责审议营业报告、制定发展计划等。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分别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和监督工作。

“群众要有利才动”^②，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③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根据群众需要，调整自己的业务。“群众需要个甚，合作社就办个甚，群众能做个甚，合作社就计划做个甚”。^④巢县在建立供销合作社时，首先就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日常需要，根据群众的需求创办合作社。合作社所售卖的货物，所生产的东西，是以解决农民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的困难为目的，而不是做生意以赚钱为目的。合作社还帮助人民发展农村副业，代人民运输公盐，救济灾民、难民，组织农村游资，发展生产，便利人民交换。赶在青黄不接时，合作社指导处还专门拨款 150 万元，交给各地合作社举办农贷，帮助春耕，利息分文不取。^⑤合作社一心为民，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拥护，合作事业也因此得到空前发展。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群众路线的强大生命力。坚持群众路线是合作社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当贯彻群众路线时，合作社就会蓬勃发展；反之，合作社发展就会出现挫折和衰退。因此，当前党和政府在制定合作社政策时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合作社才能真正成为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的经济组织。

①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2)[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534.

②《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62.

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1.

④怎样克服合作社垮台的现象[N].抗战日报,1945-05-25(04).

⑤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51.

第三节 立足现实，以问题为导向是合作社制定政策的基本要求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从创立之初到蓬勃发展，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合作社也因此赢得群众的广泛支持，成为皖江地区最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才能使党的政策真正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中共中央华中局强调“要研究和提倡当地群众习惯中所存在的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如延安的变工，淮南的扯伙和换工）以组织劳动互助运动，提高劳动效能”。^①皖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便从皖江地区民间习惯的‘变工’‘换工’客观实际出发，大力号召农民组织‘变工队’‘换工队’实行劳动互助。在工资制定标准上，既考虑当地生活标准和历史习惯，又兼顾劳动者的技能差异和工作能力，实行差异化薪酬；在人员调配方面，互助委员会综合考虑地理距离、技能匹配度、人际关系等因素，实现最优组合。

皖江抗日根据地各种类型的合作社都是根据皖江抗日根据地客观发展需要而建立的。针对大量青壮年上前线参军导致劳动力短缺，根据地便组织变工队、换工队，有效缓解了农业生产压力。为抵制资本家的剥削和工人失业，根据地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既维护了工人利益，又促进了手工业发展。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奸商的投机行为，根据地便组建消费合作社，解决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又为农产品销售拓宽了渠道。合作社组织在形式与内容上，也都从农民所需的客观实际出发，没有采取千篇一律的组织形式，而是根据农民的具体要求来解决，不凭空臆造，也不采取某种固定的形式，只要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就行。

综上所述，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在制定政策时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根据地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是否有利于革命事业和根据地建设。皖江抗日根据地对符合上述标准的政策大力推行，对不适应的政策及时修正。以实践结果为导向，确保了合作社政策始终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当前，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合作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当地实际、扎根乡土特色，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路。要深入田间地头开

^①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中共中央华中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220.

展精准调研，全面把握农民在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做到精准施策；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培育特色主导产业。要力戒盲目跟风 and 形式主义，确保各项发展举措真正落地见效，让合作社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坚实平台。

第四节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合作社发展的核心原则

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深刻揭示了劳动精神在民族存亡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1941 年皖南事变后，皖江地区面临着日伪顽军的多重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形成了“军事包围、经济绞杀”的严峻局面。在此背景下，根据地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劳动互助组和变工队，不仅解决了根据地的生存危机，更培育了宝贵的劳动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劳动被赋予了保家卫国的崇高意义。军民通过开荒种地、兴修水利等生产活动，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紧密相连；通过劳动竞赛、模范表彰等激励机制，树立了“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创造热情。1943 年无为县评选出劳动模范，其事迹通过《大江报》等媒介广泛传播，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合作社通过组织纺织、耕作、手工业等专业培训，使原本分散的农民掌握了集体劳动技能。妇女纺织合作社让家庭妇女成为生产能手，变工队使传统农民学会了协作耕种，这种技能提升极大增强了劳动者的自信心和主体意识。在集体劳动中，社员们逐渐养成了守时、保质、互助的劳动纪律。

抗战时期合作社培育的劳动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不仅支撑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更塑造了一代新人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财富超越了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的宝贵经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合作社发展的灵魂，也是推动农村经济振兴的重要力量。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合作社必须继续弘扬这一优良传统，激发内生动力，保持奋斗精神，在集体协作中实现共同发展。只有这样，合作社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生命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结语

“合作社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①面对日寇的严密封锁和疯狂破坏，皖江地区的基层党组织深入群众，从最基础的互助组起步，逐步建立起覆盖生产、消费、运输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合作体系。这一创造性实践有效整合了根据地内分散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为战时经济发展找到了有效的组织形式。

合作社这一群众性经济组织，犹如一根纽带，将分散的个体经济凝聚成抗击日寇的强大经济力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合作社不仅有效打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发展了生产，保障了军需民用，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乡村社会关系。通过共同劳动、共同享有的合作实践，村民们打破了传统小农经济的藩篱，建立起互助互信的新型人际关系。这种基于共同利益和集体认同的凝聚力，不仅增强了根据地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更为持久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使合作社成为凝聚民心、团结抗战的重要纽带。

如今，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国已成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伟大成就。然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构建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仍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作经济。要深入挖掘皖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历史经验，系统总结其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成功做法，将其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0.

参考文献

一、外文译著

- [1](美)费里曼,毕克伟,赛尔登著;陈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2](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4](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译.流产的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 [5](英)约翰希尔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二、中文著作

- [1]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2)[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 [2]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铁军文化研究新四军和安徽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研讨会论文集[C].2011.
- [3]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41) 供销合作社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 [4]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5]房列曙.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 [6]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 [7]郭万清,朱玉龙.皖江开发史[M].合肥:黄山书局,2001.

- [8]《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料选编上(1937.7-1946.6)[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
- [9]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 [10]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4]米鸿才.合作社发展简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 [15]欧阳发.经济史踪[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 [16]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M].北京:三联书店,1957.
- [17]《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 [18]王贵宸.中国农村合作经济[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 [19]邢献宝,政协无为县委员会.百年沧桑话无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 [20]辛易.雨花忠魂忠贞吕慧生烈士传[M].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 [21]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日记(2)[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
- [22]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 [23]杨德寿.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 [24]《曾希圣传》编撰委员会.曾希圣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 [2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26]张闻天.张闻天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8]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皖江抗日根据地史[M].巢湖: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2000.
- [29]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中共中央华中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 [30]中共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巢湖市中共党史资料选编(第1卷)[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 [3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M].北京:解

放军出版社,1995.

[32]中共和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和县地方史 1919-1949(第 1 卷)[M].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

[33]中共安徽省党史研究室.铁的新四军[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

三、中文论文

[1]陈家骥.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历史考查[J].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02):25-34.

[2]陈家骥.抗战时期皖江根据地的消费合作社[J].历史研究:19.

[3]曹承俊.华洋义赈会与安徽水灾救治[D].安徽大学,2012.

[4]房列曙.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经验[J].中共党史资料,2008,(01):186-196.

[5]冯越,倪进.抗战时期毛泽东农业互助合作思想之考察——以陕甘宁边区为例[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118-121.

[6]甘迎春,徐春霞,赵玉青.1942 年—1945 年皖江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研究[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6,(S1):60-62.

[7]过仕伟.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发展及其主要特点[J].安徽史学,1992,(03):67-72.

[8]黄昊.抗战时期安徽县政改革研究[D].安徽大学,2011.

[9]胡惠芳.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J].池州学院学报,2019,33(02):61-64.

[10]胡茂胜.吕惠生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J].沈阳大学学报,2007,(06):102-104+108.

[11]李雪峰,汪红叶.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工作[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28(06):5-6.

[12]梅德平.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变迁的历史考察[J].中国农史,2004,(02):103-108.

[13]马飞飞.皖江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J].党史博采(理论),2018,(04):14-15.

[14]唐启炎.皖江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5):327-329.

[15]吴云峰,金良文.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J].巢湖学院学报,2005,(01):83-86+97.

[16]王明前.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与财政经济[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2017,(05):14-18.

[17]王卫红.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历史功绩及经验启示[J].理论探索,2008,(04):93-95.

[18]汪效驷.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5):591-596.

[19]万勇.民国时期安徽的农村合作运动[D].安徽大学,2007.

[20]吴春梅.从分散到合作——民国时期安徽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02):40-49.

[21]闫庆生,黄正林.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J].甘肃理论学刊,1998,(06):57-59.

[22]余醒民.安徽怀宁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J].经济评论,1934,1(04):64.

[23]张鸣祥.略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J].黑龙江史志,2008,(08):18-19.

四、报纸文章

[1]《安徽合作旬刊》第1卷第5期.

[2]《安徽合作旬刊》第1卷第8期.

[3]《把劳动力组织起来》[N].解放日报,1943-01-25(01).

[4]《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N].解放日报,1944-02-08(01).

[5]《贯彻合作社民办政策》[N].解放日报,1942-09-08(01).

[6]《华中各地兴修水利皖中黄丝滩大堤竣工》[N].解放日报,1944-05-30(01).

[7]《合作社应向生产方面发展》[N].抗战日报,1940-12-04(01).

[8]《和兴国比一比》[N].红色中华,1934-04-30(02).

[9]《晋察冀生产运动中创造许多好办法》[N].解放日报,1945-01-18(01).

[10]《瑞金在秋收中怎样解决劳动力的问题》[N].红色中华,1934-07-19(01).

[11]《皖省水灾难民待救》[N].新华日报,1942-08-29(02).

[12]《皖中临江区合作社办得好敌占区绅商纷来入股》[N].解放日报,1944-05-22(01).

[13]《怎样克服合作社垮台的现象》[N].抗战日报,1945-05-25(04).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1]徐筱,李海涛.吕惠生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24,43(02):80-87.

致谢

时光荏苒，转眼间三年的研究生求学生涯已近尾声，不禁感叹时间流逝之快。回首这段旅程，每一步都烙印着成长的印记。在此，我谨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致以我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导师李海涛教授。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我的性格有些马马虎虎，大而化之，但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我意识到细微之处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态度与品格。老师不仅教会了我如何做学问，更让我明白了踏实做事、精益求精的重要性。未来，我会以李老师为榜样，将严谨细致融入日常，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努力在学术和生活中不断进步，不负老师的教诲与期望。

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学院的每一位老师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指导，让我在学术道路上少走弯路，更加坚定前行。特别是吴月红老师、方前移老师、虞满华老师、吴云峰老师、徐东辉老师、余文华老师、陶涛涛老师等，他们在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等关键环节中，为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细致的指导，让我受益匪浅。正是老师们的严谨治学态度和耐心教导，才让我能够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论文。

同时，我也要由衷感谢韩家勤老师、王明老师、李德才老师以及裴利萍老师，他们总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付出，关心我们的学习与生活。此外，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每一位同门，漆帆师姐、张娜师姐、郑春伟同学、刘洋师弟、杨杰师妹、赵薇师妹，能够与你们相遇，是我研究生生涯中的一大幸事。无论是在学术讨论中，还是在生活琐事上，你们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让我感受到同门情谊的深厚与温暖。还要感谢我的室友李亚男、高文茜、王莉。那些深夜的畅谈，不仅让我在忙碌的学习中找到了放松的港湾，也让我一次次重拾动力，继续前行。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 22 级所有的同学。你们的陪伴让这段学术旅程充满了温暖与力量。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是最坚实的后盾，无论我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你们始终用无私的爱与包容，给予我无尽的支持与鼓励。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用实际行动回报你们的付出与期望。感谢你们，永远爱你们！